

#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

邹至庄、刘素芬

访问时间：一九九六年六月至七月  
一九九九年五月  
二〇〇六年七月

访问地点：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访问次数：十八次

访问者：刘素芬

# 目 录

序

2007年再版序

前言（一）

前言（二）

## 一、家世与环境

（一）家世

（二）广州的童年

（三）港澳求学

## 二、负笈美国与学成任教

（一）康乃尔的大学生活

（二）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三）教学与研究经历

## 三、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一）推广经济学教育

（二）担任政府经济顾问

（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 四、推广中国经济学教育

（一）一九八〇年重返中国

（二）一九八二年中国之行

（三）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

（1）缘起

（2）一九八四年

（3）一九八五年

（4）一九八六年

（5）其他

（四）留学生与现代经济学

（1）选派留学生出国

（2）经济学教育现况

（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五）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 五、中国经济改革

### (一)经济改革与政策建议

- (1) 一九八四年
- (2) 一九八五年
- (3) 一九八六年
- (4) 一九八七年
- (5) 一九八八年以降
- (6) 其他

### (二)担任中国经济顾问

### (三)六四天安门事件

### (四)中国经济研究

- (1)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六年
- (2) 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七年

## 六、香港现状与未来展望

### (一)香港前途研究会

### (二)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

### (三)香港九七回归

### (四)香港的大学及其他

## 七、学术生涯回顾

### (一)研究领域与成果

### (二)近期研究成果

### (三)教学相长

### (四)近年学术活动

## 八、家庭生活

### 附录一：邹陈国瑞女士访问纪录

### 附录二：邹至庄先生年表

### 附录三：邹至庄先生著作

### 附录四：经济学留学生名单

### 附录五：留学生申请入学推荐信

## 索引

## 序

我很感谢刘素芬、樊沁萍两位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对我个人而言，趁此机会把我一生至今她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事情回忆一下，以之反省，对日后的生活及工作必有裨益。有些事情或想法，读者或许感兴趣。我说话很直，要说就说，想了就说，若有些地方对别人不客气，还请他们原谅。

访问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共十二次。正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南港中研院举行，同时我也是经济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与该所同仁常谈论研究问题。在此十天除参加会议各种节目及研讨之外，没有太多时间接受访问，所以很多纪录不够详细。包括早年在台湾，近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在美国研究与教学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可以加一倍以上的篇幅来详述，只能留待日后想起来再补充。

在学术界，每位同仁写一本书或一篇专题论文，都有故事可说。A. Pagan 教授访问了我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经过，刊登在 1995 年的《计量经济理论》（*Econometric Theory*）第 597 至 624 页，可供读者参考。又如我因为主持并参加动态经济与控制学会年会，在七〇年代后期与八〇年代初期常到欧洲各国进行学术活动；许多在美国经济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趣事；在学术上，许多朋友、师长、学生对我的影响等。以上都没有包括在纪录内，也很难用简短的篇幅补充。

刘、樊两位教授又以书面方式问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估与看法，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选择的得奖者从 1960 年开始大致都很有水平，选得不错。有些是大家一致公认对经济学有很大贡献的，如 Arrow、Friedman、Samuelson、Tinbergen 等。但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得奖者，大家（指世界第一流经济学系的教授，或某些重要经济学会的全体会员，或包括曾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不一定同意。虽然没有太不够水平的，但亦不乏众人认为相当平凡的。得奖是一种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这么重要。经济学界是相当有判断能力的，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般同行都认识，对他或她的贡献都有评价，不用诺贝尔委员会去评断。换言之，如果经济学界承认你的贡献，不需要诺贝尔委员会来肯定；如果经济学界不承认你有重要的贡献，他们不愿意读你的作品，连研究生也不读，对学术研究没有影响，就是得了诺贝尔奖，也都没有大作用。充其量只有一天的报载，数日后大家都忘记了。试问经济学研究生，他们能记得多少位经济学的诺贝尔得奖者？大致想不出六位，更不用说一般不专攻经济学的知识份子了。

上周 1996 年的经济学奖公布了，其中之一系 William Vickrey，我觉得

选得好，虽然事前我没有猜到他，因为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资格。但选出之后，我是同意的。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已退休的教授，六〇年代我当该校兼任教授时，他是系主任。他在上星期二（十月八日）得奖，我十分高兴。次日，星期三，我去上博士生二年级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time series）的课，共有十九位学生。我问：「有谁听过 Vickrey 教授？请举手！」只有三位学生举手。获奖者的知名度由此可见。数年前计量经济学前辈 Trygve Haavelmo 得奖，我也曾问选修计量课程的二年级博士生十数人，只有两人举手说认识他。Vickrey 教授的际遇令人既喜又悲，得奖三日后的星期五，他在晚上十一时许独自开车外出，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医生说他在这三日内忙于接电话、接受记者访问等事，过于操劳，可能影响心脏的运作，以致有此悲剧。

我今早（1996 年十月十六日）在普林斯顿家里写序，因为要回答访问人的书面问题，而刚巧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在上周揭晓，所以顺道在这里一并叙述，或不免有些突兀。如果是当面访问，我会说下面关于 Vickrey 教授的一些掌故。数年前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此之前我已当选为该会理事（Council member，共有六位，三年一任，一年选出两位）。有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理事会会议，当然由会长主持，订于三月份的某一天上午八时半或九时在一所饭店开会。理事同仁都投宿该旅馆，唯有主席从纽约乘半夜开的火车，早晨七点多钟到华盛顿来开会。在火车上睡觉当然没有旅馆舒服，而且要等到半夜才能上车，很早就要起来准备下车，为的是节省一晚的住宿费（按该旅馆因为欢迎年底经济学会会员订房，数目多达数百或上千的房间，所以优待理事们免费住宿）。这还不算，下午散会后，会长和我同去火车站搭车，普城是从华府到纽约必经之路。他不肯花五美元的计程车费，一定要走十分钟的路到地下铁车站，再花一美元乘地下铁去火车站。我只得陪着去。到火车站后，我看见四十分钟后有一班车要开，当然想搭这班车。先生却不肯，说要坐等（不坐在舒服的餐厅而坐在公用的硬椅上）两个多小时后的晚车，省下十八美元左右！我实在不能再奉陪了。Vickrey 先生惯于节省的程度有如此者。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系设计在不同时间收不同的路费。他的主张在美国应用不广，但在星加坡市中心的汽车交通费上实行了。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在下午下班时间收费比晚上高，因此他可能是个实行自己交通收费理论的消费者。上周我知道他电话忙，所以想过几天再恭喜他得奖，不料却已失去机会，现在只能缅怀他的旧事。

我今年足六十五岁，要做的事还很多。现在正是美国总统竞选最热闹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生于 1923 年七月，现年七十三岁，比我长七年多，他正在寻求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可知我离此刻还远，需要继续累积经验和学识，才有资格做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如有进展，日后将向大家交待，谢谢读者的关注，并请指教。

1996 年十月十六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 2007 年再版序

自从 1996 年《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出版以后，我继续致力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的工作，在此向读者报告，书名也因此由《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改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还请读者指教。

再次感谢刘素芬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刘教授的观点是「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她又说：「先生将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虽然我很佩服刘教授的理想，的确台湾经验是我在 1980 年回到中国大陆之前累积的重要经验之一，此外还包括我对经济学的学习，以及在 IBM 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的顾问等经历。1980 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其中也不乏可供现在的台湾学习之处，从本书第二版的新内容可以发现这些例证。

有些中国朋友问我为何不找一位国内学者替我写传？其中一个理由是很难找到有像刘教授水平的人合作；另一个理由是本书的部分内容恐怕不容易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使在国外出版以后，能否进口中国大陆，可能也有问题。

2007 年五月十六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 前言(一)

1994 年秋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时值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哈佛人文荟萃，许多海内、外中国人汇聚一地，每为此展开激辩，然而终难有所定论。在繁忙的课业与研究之余，两岸关系问题成为我最沉重的负担。

在此背景之下，有幸旁听哈大历史系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毋宁是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选择。入江教授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巨擘，他最重要的学术论点是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研究取向之外，另辟蹊径提倡文化研究取向，强调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他的主张恰能为两岸轳轳的政治、经济问题，提供另一类思考的空间。

1978 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社会各界掀起中国热，在学术界亦历久不衰，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哈大自不例外。相形之下，有关台湾的研究可说凤毛麟角。除了经济发展课上偶一提及之外，唯有人类学系张光直（K. C. Chang）教授开有「台湾研究」课程。张教授认为尽管没有外国学生选修，显见台湾研究尚未能唤起国际学界的充分注意，但是面对来自海峡两岸的学生，得以英文、中文、台语交互使用，大为提高上课的自由度与乐趣。张教授当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且健康情形日趋恶化，在于公于私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仍愿为台湾研究贡献心力，他的执着与付出，令我深为感动。他认为台湾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堪称学术研究的微实验室，鼓励学生以科际整合的角度研究台湾学。因此，结合入江教授与张教授的说法，我认为将台湾定位为人类文化的实验室，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此同时，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在顾应昌院士的建议之下，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决策研究系列」主题研究计划，研究 1949 年以后的台湾发展经验。其中我与同事樊沁萍博士合作的「美援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计划，正符合前述尝试摸索的新方向。基于此一精神鼓舞，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更能顺利进行。1996 年夏初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认为 1950 年代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的互动，在台湾的经济决策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于此一台湾经验的结论，对于其他的社会经济体有何意义，我们尚不敢妄下论断。

1996 年六月适逢邹至庄先生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经济



所发表公开演讲，提及他参加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猛然醒悟邹院士本身就是传递台湾经验的鲜活实例，遂引起我们进行此一口述访问的动机。承蒙先生慨然允诺，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访问。在访问进行中，先生的做事效率与精神毅力，令我们印象深刻。限于时间迫促，访问纪录只能略尽先生生平之一二，但已足以说明借着欧美现代经济学的媒介，先生将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

我们感谢邹至庄院士接受口述访问，并细心审阅初稿。我们也感谢钟杏珠小姐不惮辛劳帮忙记录、输入电脑及校对的工作。承蒙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补助经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小组召集人张力先生和曾金兰小姐提供协助；以及世界科学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答应出版本书，在此一并致谢。谨以此书献给为人类未来与和平努力不懈的伟大心灵。

刘素芬 谨识

1996 年秋于台北南港

## 前言(二)

2006年四月接获邹至庄先生来函告知，有意修订十年前出版的口述访问，我欣然从命。因为在过去十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已经有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先生身为一个播种的园丁，一方面感受到收成的喜悦，另一方面也关切未来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以上均在此一十年回顾中充分表露无遗，既创造历史，也见证历史的发展，先生可谓当之无愧。

更重要的是，先生凭着敏锐的观察与犀利的专业判断，使他得以见人之所未见、勇于言人之所未敢言。这些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的诤言谏论，未必尽是人所未见，却往往是人所未敢言。先生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所谓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风骨或理想，毋宁说是时势造英雄。其中一部份原因固然可以归之于先生的人格特质，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制有关。「我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在追求个人自利的同时，也达成社会利益。」经济学的陶冶和训练，既是先生立身处世的信念与原则，也造就先生成为一个跨国界的专业人士。当年轻资浅的归国学者，徘徊在泛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之下，对于个人的行止进退无所适从，更忧虑学术专业的落后，诚如先生所说：「学术成就必须通过市场考验。」「经济学的就业市场有了国际竞争，也是一件好事。」无疑给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明路。

先生是世界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家，1960年即以Chow Test的成名作著称于世，时年三十岁。其后担任台湾和中国的经济顾问，更将计量经济应用到两岸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上，成果斐然。特别是将欧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引进中国，并协助中国教育部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经济，培养人才，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深且巨。然而在光环的背后，先生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压力很大，一方面同事不承认我做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我教书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我是计量经济学的教授，而非中国经济的教授。我有时候觉得研究中国经济是牺牲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研究。」充分反应出知识份子的良心挣扎与学术市场竞争的铁律，并无资深、资浅的差别。

先生自言深受童年教育的影响，也认为人才培养不限于学校教育，肯定家庭、社会、文化对于人力资本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先生说：「这是中国的传统，非常注重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从自己家里做起。长年担任普大国际中心主任的邹夫人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中国文化、台湾文化，还有中南美洲的拉丁文化。我们相处得很好，

十分融洽。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家庭很普遍。」可见家庭是传递文化的基本单位。

身为计量经济学的泰斗，先生对于数字的敏感可说是一种天赋，对于精确的追求也就成了一种执着。在整理口述访问稿的过程之中，先生字斟句酌，甚至连接词、形容词、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也让共同参与工作的我得到最好的学习，深深体会到学术求真的精神，在经济学与历史学并无分轩轻。单就这一点而言，我相信先生的口述访问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一页。

刘素芬 谨识

2007年五月于台北南港

## 一、家世与环境

### （一）家世

我于 1930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东山槟园。护照上记载我出生于 1929 年，这是登记时弄错了。1982 年我曾和朋友一起旧地重游，那栋老房子槟园还在。先父邹殿邦；母亲罗氏，闺名佩莲。我排行第七，是家里最小的，上有两个哥哥四个姊姊，依次是大哥（至强，比我大十三岁）、大姊（令华，大十一岁）、二哥（至毅，大十岁）、二姊（令昭，大九岁）、四姊（令宪，大七岁）、五姊（令辉，大一岁）。三姊是我二叔的女儿，因为按祖父派下大排行的缘故。

我的父亲出生于 1895 年，前两年 1993 年才去世，高寿九十有九。他是广州商业界的闻人，担任商会会长多年，俨然是同业之间的领袖。先祖父静存公，是个生意人，事业经营不算太成功，年纪不大很早就退休。当时父亲只有十六岁，他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一个姊姊，下有二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祖父叫父亲去钱庄做管理，以负担家计。父亲不愿意做，他想要继续念书。祖父说先试着做做看，如果真是不行的话，就可以不做。父亲做了不久，赚了许多钱，才二十几岁就成了百万富翁。先是从事广信钱庄的生意，后来营业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盐业等，无所不做。当我出生的时候，他的产业已经非常庞大。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我们迁到香港；1942 年日本进占香港，再迁澳门；1945 年迁回广州。1946 年我的二哥邹至毅自美学成返国，他是念建筑的，便帮忙父亲整理房地产。他在墙上挂了一张广州地图，用小针标示房地产，针头密密麻麻布满了地图上，可见父亲产业之多。因为战争的关系，1945 年广州的房地产大致与 1937 年相同，没有太大的变动。

父亲年轻的时候认识不少政界要人，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是他的朋友。胡汉民当时是孙中山先生之下的第二人，与汪兆铭并称，他们两人在国民党内的资格都比蒋介石老。胡汉民看中我的父亲，推他做商会主席。当时父亲只有三十多岁，而即将卸任的商会主席有七十多岁，两人年纪、资历相差悬殊，所以其中胡汉民出了不少力帮忙。以后父亲

连任商会主席多年。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廖仲恺，他与胡汉民两人不太对。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廖仲恺遇刺身亡，而主谋凶手是何人，一直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与胡汉民派有关。

廖仲恺常常告诉我父亲说他不要钱，要钱不好。他叫我父亲多赚点钱，钱赚得多了，可以帮忙国民党做事。父亲帮孙中山先生做事，但没有加入国民党。父亲说胡汉民和廖仲恺都教导他很多事情，他们两人派别不同，他和各派的人都合作，自己没有什么派别。父亲是个商人，他知道廖仲恺亲共，告诉廖仲恺共产党做事不可靠。廖仲恺不同意他的说法。即使如此，他们两个人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廖仲恺遇刺前一两天还和父亲谈过，他自知身陷险地。廖仲恺死后，父亲和廖家仍有来往，他看着廖承志长大。

父亲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整天在外面忙自己的事业，不管家里的事情，但很重视子女教育。家里的事，都由母亲一个人在打理。父亲与子女们不亲，唯有和我及五姊较亲近。这是因为1942年我十一岁的时候，为躲避日本人，小家庭（两兄已赴美，三个姊姊进入中国内地）从香港迁到澳门，时值中日战争期间，避居澳门横竖无事，父亲整天带我去游泳，得他亲炙不少。所以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和两个哥哥不同。

父亲教导我不少事情，使我受益良多，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教诲是：易地而处和有恒。所谓易地而处，就是从对方的观点和立场看问题，不要只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人谈话的时候，要注意对方的观点。我自己另外从经济学学到一种体会，就是和别人一起做事，一定要诉诸对方的利益，所以我从来不求人做事。这个道理可以替父亲的训示做个补充。和别人合作，除非是对别人有利益的事，否则不会去推动，所以成功的机会很大。与别人对话要察颜观色，也就是从对方立场出发。如果自己打定主意去找别人谈事情，必须注意观察对方的情形，如果发现对方心不在焉或有其他心事，没有什么兴趣，就暂且搁下不提。等以后时机成熟，再提出来讨论。第二点，做事情要有恒心。父亲自年轻时起练太极拳，历时数十年从不间断。我这一方面的工夫就比父亲差多了，近年稍好，尽量保持每天练习一个多小时高尔夫球或游泳的运动习惯。

在为人处世方面，父亲有他的道理，他的教诲我到现在仍然受用。我觉得自己很年轻，过去累积的经验很有用，每天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使自己做事能力越来越高。不过，这种能力若用在复杂的数学研究之上，就不一定管用了。

## （二）广州的童年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搬家，有时候住在广州，有时候住在香港。有一段时期父亲精神不好，经常去旅游，也在北京住了半年。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去日本将近半年，我和五姊就住在上海舅母家里。放暑假的时候，常常全家去青岛游泳。虽然常常搬家，印象较深的还是广州的两个房子。一个房子较大，后来被广州军方占用；另外一个房子较小，但也有五、六个睡房。房子建在珠江之上，下面就是水，因此胡汉民命名为「海屋」，并亲自题字。

1936年我开始念书，那时候只有五、六岁，在家里的私塾启蒙。这件事情与我的三个姊姊有关。我的四舅父是罗仁伯先生，他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回香港办教育，是个教育家。现在香港有一个仁伯学校，就是纪念他的。我的母亲当时也随他赴英国念预科，所以英文很流利。我的父亲向四舅父请教子女教育问题。四舅父说先念英文，再念中文。这个建议可把人害惨了！父亲便送三个姊姊去香港念英文，后来看他们连中文都不会写，所以叫他们回广州，请个女先生曹老师每天在家里上课。我和四个姊姊一起上课，我做班长，负责上下课摇铃。我住在瑞士的大姊，当年是十六、七岁，她到今天仍然耿耿于怀曹老师对我偏心。其实不过是老师看我是小孩子，很好玩，所以比较喜欢我。念书的时候，每个人一张桌子。老师一走进来，我们必须起立致敬。这样前后念了约一年之久。小时候的事情都忘了，只记得海屋旁边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赛龙船等小事。

## （三）港澳求学

1937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八月我们从广州搬去香港，印象很深刻。因为家里买了两部自行车，我刚学会骑，正觉得很得意。本来家里住在广州好好的，战争突然爆发，必须坐火车搬去香港，好像难民一样，对我的心理是很大的打击。全家搬到香港麦当奴道（MacDonnell Road）三十八号，住得也不错，大概是1920年代买的房子。八、九月开学之后，母亲送我去念圣保罗小学二年级。圣保罗设有中、小学部，现在是香港公认最好的中学，有些学生毕业之后申请去普林斯顿念大学。我念书之时，距今已将近六十年，校舍依然还在。

在圣保罗小学念完二年级之后，母亲想要我转读香港的岭南小学。广州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是1930年代人称华南最好的学府。1938年大哥赴美留学之前，先在战时搬到香港的岭南大学念了一年书。后来岭南中学也因避战祸搬到香港，1939年二哥也赴美留学，之前就在岭南中学念书。我插班岭南小学三年级，没有考上。我埋怨母亲不先告诉我要转校，没有准备，暑假天天去游泳，从前学过的东西都忘了，所以考不上。母亲托人向校长陈汝锐先生关说，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念岭南小学、中学毕业的，而且父亲又捐钱给岭南兴建十友堂（十友堂由十个人共同捐建，一人捐一万元，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于是校长让我重读二年级。我在圣保罗念书之时，成绩大概都在前五名之内，最好的一次是第三名，第一、二名都是女生。我重读二年级，分数近乎全班最高，因为功课都已经学过了。这对我很有好处，从此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绩。我当时不太用功，对念书没有特别兴趣，只喜欢玩。

我很喜欢岭南小学，特别是其中有些先生很好。岭南的学生活动办得很好。在美国大家公认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对学校的感情最深，每年订有校友日，校友很踊跃回来参加，捐款也很多。岭南校友对学校也很热心，因为它注重学生生活、运动、打球等。学校要求学生住读，不过我在香港是走读。我有一个朋友邓炽康，他也是走读生。我们两人是邻居，所以共乘车上下学。上学的时候，他搭我的车去；放学的时候，我搭他的车回家。我的足球始终踢不好，就是因为我走读的缘故。因为大家都是每天三点下课之后练习，我没有办法参加。至于其他的活动，如圣诞晚会、演戏等，我都参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进攻香港，情势很紧张。十二月八日我和五姊刚准备去上学，听到日机轰炸不用上学，两人都很高兴。后来有一个炸弹，炸中我家的房子，房子二层楼的凉台打了一个大洞。

幸好我们都躲在地下室，家里没有人伤亡，运气很好。我们全家搬到父亲的一个俱乐部去住，仍然继续上学。因为日本人占领香港，岭南学校关门，我暂时先念华仁小学。1942年我家搬去澳门，仍然念岭南初中。当时的岭南初中用现在澳门岭南中学松山校址。我从前的邻居邓炽康，因为战争期间局势混乱的关系，一连跳了两级。我受了他的影响，也跟着跳级。我从小学六年级跳读初中二年级。初二读完之后，考入培正高中跳读高一。跳读有利也有弊，其中得失很难说。我在培正念了一学期，又转回岭南中学。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我念高一。

在澳门这段期间，父亲常在家里，教我不少东西，使我一生受益良多。我在澳门念书的时候，自觉待人处事相当幼稚，有些同学比较老成世故。例如刘尚志，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可能是看多了三国演义，颇懂权术手腕。我常常被他耍得团团转，但我们还是好朋友。他目前在加拿大。另一个同学韦基尧，他的父亲是二天堂制药厂的老板。我们三个人在班上书念得最好，感情也很好。我对绘画有兴趣，水彩、国画都喜欢，三个人常常一起去看画展。那时候国画南派的大师高剑父也住在澳门，开画展的时候，我们也去参观。他是当时仅次于张大千的国画大师。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人投降，大家都很高兴。学校搬回广州，租了一条船，全部学生都上船，大家很兴奋。终于要回到久违的故乡，我的感情很丰富，也很激动。

在中国，中学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在台湾也是如此，在国外就简单多了。难怪美国人搞外交不如中国人，在美国搞政治，人事方面也不复杂。在中学那几年，刘尚志是学生领袖，担任学生会会长。这其中也有一些政治运作，人事相当复杂。有些人不喜欢他，因为我书念得好，推我当社长。我是一个念书的人，做不来学生活动的事，很怕担任社长，但又不能拒绝，每次主持开会都很紧张，但我也因此学到一些经验。



## 二、负笈美国

### （一）康乃尔的大学生活

1947年我从中学毕业。我的二哥已于1946年自美学成返国。父亲要大哥回来，但是大哥不肯，仍然留在美国。我也申请美国大学，想念工科。二哥说美国好的工科大学有麻州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普渡大学三个学校，于是我就申请这三个学校。其中麻州理工学院没有回信，我以为它不接受我的申请（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学做事的惯例，无论接受或拒绝一律会回信答复。大约信在邮寄的途中遗失了。后来我拿到学位之后，也曾去麻州理工学院任教。），康乃尔大学和我通过几回信，1948年接受我的入学申请。

我得到康乃尔大学的入学许可，但是要得到美国领事签证很不容易。本来在此之前有一段时期，要得到签证并不难。但后来就改了，签证需要两封美国公民的介绍信、身体检查、两千美元。介绍信只好请岭南大学的英文老师和另一位美国教授帮忙。身体检查如果有沙眼等毛病必须治好。另外带两千美元做为财务证明。1948年美国大学一年的学费是六百美元，每个月生活费一百美元，房租不到三十美元，所以两千美元一年也用不完。为了办美国签证，我花了不少时间。

我原来想念工科，母亲鼓励我学政治，她说学工的人太多了，而且国家需要政治人才。我本来可以反对，但是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改念政治。到了康乃尔大学后，第一个学期有美国政府和西方历史两个课程。每个星期要读一百多页的参考书籍，加上英文又不好，念得很辛苦。我对于美国政府一无所知，专有名词用语既看不懂，对美国社会更不了解，整天查字典。第一个学期除了吃中饭和晚饭的两个小时之外，简直念书念个不停。可是我从来不开夜车，念书念到十点半就去洗澡，然后听New York Times电台的古典音乐，每天一定十一点就寝。因为开夜车不是长久之计。星期六或星期日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中国餐馆吃饭，往返要花一个半小时。

期中考时，美国政府和西方历史两门课程的成绩分别是 50 分和 70 分，到期末考时两科都是 80 分。我向来念数学很容易，基础很好，动辄拿 99、100 分，但念文科很吃力。后来我念远东经济，经济学拿到 85 分，但完全不懂。我的第一个经济学老师是 Don Gordon，他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仍然还在教书和做研究。他当时是研究生兼助教，把五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微观经济学加宏观经济学，在一个学期之内全部教完。他采用 1948 年史丹福大学教授 Lorie Tarshis 写的教科书。我完全不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但念书考试我会。凯因斯（John M. Keynes）的方程式  $Y=C+I$ （所得=消费+投资），我会计算乘数（multiplier），考试做得出答案来。得到 B 或 B+，已经算是中上的成绩，可是莫名其妙。如微观经济学里的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之间的经济意义完全不懂，只是会算数学。不单是我一人如此，现在的学生也很可能如此，真正通经济学的人不多。

举例来说，1995 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经济的课程，用我自己写的两本书做教科书。我不能讲一讲毛泽东的故事就算了事，而是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问题。每周一、三上课。另有习题作业，每周一公布题目，周五交回来，由助教带着做习题解答。当时这位助教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找到不错的教职，但是有时候习题做不出来。我有时候去教室看一下，他的答案做错了，有一些我觉得很基本的问题，他也不一定会应用。

由此又要提到台湾经验的意义，1966 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邢慕寰先生邀请我来台湾教计量经济学（1996 年七月四日是我来台湾的三十周年纪念日）。那时候经济所刚落成不久，是全中研院最新的建筑。我从台湾工作经验中学了不少经济学，不只是理论，还有应用：如何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拿来实际应用。我在 1955 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写了一些有名的论文，但是直到 1964 年做了正教授，对于经济学最简单的应用，还是不完全懂。所以来台湾工作对于我的经济学与经济研究受益不浅，只是会写理论性的论文不一定能了解应用。

我本来念政治，后来改念经济，是受到 Alfred Kahn 的影响。Kahn 教授书教得很好，我从此对经济学发生兴趣，于是在三年级转念经济学。我最有兴趣的是计量经济学，当时康乃尔经济系没有这一方面的师资，1951 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1967 年我第二次来台，是应刘大中之邀来参加他所发起的台大经济学讲学班。我向刘大中也学了很多，他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当时他还邀请了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来台

湾，由Simon Kuznets领队。Alfred Kahn也在内，他当时教国际贸易，现在还住在康乃尔。

## （二）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第一位教授是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当时在那儿教书。我觉得他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与Paul Samuelson、Kenneth J. Arrow三人并称为当时在美国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学家。我的同班同学之中，最特出的是Gary S. Becker，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那里的师资比康乃尔好，有William Baumol和Jacob Viner等第一流的人物，所以他的水准比我高。

我初到芝加哥就很佩服Milton Friedman，他对我影响很大。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来往，常常互相通信。我觉得他年纪大了之后比较顽固。1970年代他大约六十岁，芝加哥大学有些年轻的教授说他仍在教当年的那一套东西。我念书的时候，芝加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研究院，只要翻一翻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的名单即可知。又有Cowles Commission，是一所研究数理和计量经济学最有名的研究所。那些最杰出的年轻学者，如Lawrence Klein、Kenneth J. Arrow等人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没去，等到1951年我去芝加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去了一个最好的学校，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和Friedman、Leonard Jimmie Savage（统计学大师）他们学习过，整个做学问的作风将会完全不同。我学习他们的想法，看他们如何思考和讨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会上受益最多。Friedman对货币经济学有兴趣，组织了一个货币理论讨论会，Becker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曾在他的讨论会上报告，后来在1957年出版。我认为在芝加哥所受的训练是很难能可贵的。我与Milton Friedman亦师亦友的交情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使我一生受益良多。他过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弗里德曼：为学、为人与中国〉表达缅怀之情，刊登在2007年四月的《金融博览》和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上。

### （三）教学与研究经历

我去麻州理工学院教书，是凭Friedman与Alan Wallis的两封介绍信促成的，也没有经过面试。该校史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又译作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是Pan Brooks，他从前担任过Sears公司的副经理。副院长是Eli Shapiro，他负责管理人事，是Friedman的好朋友，接到介绍信立刻给我教职。当时麻州理工学院有位副教授Howard Johnson，后来成为校长。我在那儿教了四年书，除了教书之外，也有不少其他的事。美国的经济学分成两大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剑桥学派。我24岁拿到芝加哥博士学位，深受Friedman影响，到麻州理工学院教书，向Paul Samuelson和Robert Solow等大师学习，听到另一派不同的意见。Samuelson现在还写文章，（1995年香港办了一个《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期刊，内容不限于太平洋经济，1996年一月Samuelson仍投了稿，在第一期刊出。）Solow对计量经济学有兴趣，我和他谈得较多。另外哈佛大学也有一批学者，彼此常往来。

1959年三月康乃尔大学要聘我为副教授，麻州理工学院要我再等一年再考虑升级，虽然麻州理工学院比较好，可是康乃尔是我的母校。因此我决定接受康乃尔的聘约去那里教了三年书。我在康乃尔念大学的回忆很美好，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念书，生活很简单。但成家以后住在那儿，觉得冷清，交通不方便，没什么活动，连个像样的中国餐馆都没有。

1962年我被Ralph E. Gomory请去IBM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做事。Gomory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在IBM主管一个小组，邀请我去IBM设在Yorktown Heights的研究中心当研究员。研究中心的地点靠近纽约城的北边三十英里。我原来不想辞去康乃尔的教职，只是申请去做访问研究。到了那儿三、四个月之后，觉得IBM的环境很好，没有什么责任，光是写文章发表，很单纯。于是辞去教职，在IBM专任。我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晚上和周末都不做事。我的工作主要是发表论

文，从 1962 年到 1970 年我写了好几篇重要的论文，就是在这儿完成的。在IBM期间，我从 1964 年起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课，他们想聘请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原来希望我去专任，不成之后便想聘我为讲座教授，我没接受。1969 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也曾想聘我为讲座教授，我也没有接受。

1970 年Richard Quandt教授请我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说Oscar Morgenstern教授 1970 年即将退休，我可以去接任。我当时在IBM专职，还兼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不想去普林斯顿，但不好直接拒绝，便说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一星期之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当天午餐时，我告诉同事Alan Hoffman关于普林斯顿的事情。他劝我不要拒绝，去谈一谈也好。于是我和Quandt教授说任教之事可以商量。我先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遇到Morgenstern教授，他对普林斯顿不太满意，觉得校方不够重视他。回来之后，我仔细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在IBM任职很愉快，生活也很好，但是那年我三十九岁，将近四十岁，虽然现在情况很好，将来年纪大了，继续留在IBM可能有问题，所以决定离开。事后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1970 年代IBM的黄金时代过去，股票价格也下跌，成长慢下来，研究也没有那么自由，必须以对公司有利与否来衡量。何况 1980 年代我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若仍留在IBM，受到公司观点的限制，或许不能自由的进行。我在普林斯顿任教，直到 2001 年退休，而当初邀我去任教的Quandt教授早已于 1995 年退休了。

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0 年至 1971 年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因为已经答应了对方。我之所以去哥伦比亚大学兼任，与Becker教授有关，他和Jacob Mincer筹组了一个劳动经济学讨论会，我去参加。林安乐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我指导他写论文，后来也和他合作写文章，他的博士学位是罗彻斯特大学授与的。

我在IBM公司的工作，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是担任副总裁的顾问，所以我有两个办公室。我在IBM学到的经验是企业界的想法与学术界的观点不同。IBM在 1960 年代是全盛时期，业务欣欣向荣。

1970 年代我的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1980 年以后我开始持续研究中国经济，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附录三所列的著作部分。

### 三、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 (一) 推广经济学教育

1966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邢慕寰先生邀请我来台湾讲学，因为经济所和台大经济系合办经济学暑期讲学班。讲学班一开始我就来了，顾应昌随后也来。我们住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里，是一栋日式的平房，很干净整洁。我们请了个佣人烧饭。宿舍屋后是一片水田，田里有水牛耕作，我们出国多年很少见到这种景象，还特地拍照留念。

这是我首次用中文讲经济学，并认识了政府经济行政首长，参加座谈会并交换意见，是刘大中邀请我参加的。1967年我第二次来台湾，也是大中推动的，另外还邀请了其他的经济学者如Kahn、Kuznets等人，来台湾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当时院长是王世杰（雪艇）先生。

1966年中央研究院主办经济学讲学班，透过王雪艇院长的安排，我第一次见到蒋中正总统。由王院长带队，出席的经济学者包括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等，加上国内其他方面的人，包括蒋经国先生，合计约有二十人。蒋总统让我们等了一下，他才出来会客。我们采马蹄型的坐法，一面吃点心，一面谈话。王院长帮我们一一介绍，他说我是会见中最年轻的海外学者，我那年三十五岁。在那之前的两个星期内，大中已经安排我见过不少部长和院士。每次开会，大中都要找经济部长、交通部长等人来参加，并替我介绍严家淦、俞国华、李国鼎等人，这些人和我们交换意见。另外，大中想推荐我当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和院士们素不相识，于是他带我去拜访多位院士，如李济之、劳干等人。李济之名气大，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两个人相谈甚欢。各种场合的谈话，我都要动脑筋如何发言。当蒋总统会见之时，我想今天应该不需要我说话，所以很放心。王院长的声音很低，我听不太懂，又见大中在座，有事也轮不到我发言，所以也不注意听，径自吃点心。突然听见邻座的邢先生告诉我说轮到我了，当时我正专心吃点心，毫无心理准备，只好站起来，幸亏走到麦克风之前，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准备。我说第一次见到总统，

觉得很兴奋。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在中学的时候，他正领导对日抗战，1945年抗战胜利，我很崇拜他。还说我1948年出国，1966年这是我第一次回国等其他事情，说完就回座去了。回座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剧烈的心跳还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实在是太紧张了。平日我演讲之时，只要有15分钟的准备功夫，表现就会大不相同。这次是因为心不在焉，毫无准备的结果，我学到教训下次应该专心一些。

王世杰院长很有办事方法。1966年我在IBM做事，同时也去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John Meyer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和我同是1955年毕业的。本校毕业后能立即在哈佛任教而升为正教授是不简单的事，按照哈佛大学惯例，学生毕业拿到学位之后，通常要去外面其他学校转一下，历练一番，才有机会回来任教。1966年他休假，请我去客座访问，并代他教课。1966年冬天，王雪艇带一批人去哈佛大学，进行中央研究院与美国的合作计划。当时中央研究院既没人又没钱，如何去和美方合作？王雪艇很聪明，他拿我们这些在美学人当资本，刚巧我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就把我算入中央研究院的代表。哈佛大学经济系很有趣，系里派别林立有如军阀割据，年轻的副教授完全不受尊重，和研究生一样。系上举办宴会，全是教授来参加，从不邀请副教授，仿佛他们不算系上一份子。Simon Kuznets是哈佛的教授，并代表国家科学院。王雪艇派大中和我代表中央研究院，我们三人和Kuznets谈双方合作之事。

我们合作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是1967年在台湾开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经济发展。大中因此首开台湾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先例。1967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开了好几天，相当成功，台湾的经济学家给外国人很好的印象。会中每人各自发表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听李国鼎公开演讲，外人不知台湾有李国鼎这样的人才（他曾留学英国，原来学物理），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有些不同。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去旅游，由Kuznets领队，每到一处要听对方做简报，按规矩必须穿着正式。台湾天气很热，Kuznets不太习惯，他说他是牺牲自己，为我们打领带，我们跟在后面的人可以穿得随便一些。1966年我第一次来台湾时，类似的官场规矩一点也不懂。当时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请我们去开会。我一去就坐下来，别人告诉我这是刘（大中）先生的位子。我不懂得有上位、下位之分，所以随便坐。再如1968年或1969年张兹闾和主计处张导民处长去美国访问。当时我在IBM做事，负责招待他们，做简报。我们几个人随便坐，张处长坚持一定要张兹闾坐大位。张兹闾说：「在美国没有这种习惯，大家可以随意坐。」而台湾在同样的场合仍保有一些中国人的官场习惯或作风。

Kuznets很热心，对台湾贡献不少。他是中央研究院仅有的两位外籍院士之一，另外一位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Kuznets善于分析资料，研究各国的经济发展，台湾是其中之一。Milton Friedman在1931年或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没有拿到学位，直到1945年或1946年才得到博士学位。他的成名作*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s*，就是和Kuznets合写的。Friedman擅长将经济理论与实务数字资料结合，他的学生如Becker、Robert E. Lucas, Jr.也都有这种本事，所以使芝加哥学派极负盛名。Kuznets在台湾最想见的人是叶公超先生，我们一同去见叶表叔。他谈笑风生，说到抗日时的经验与蒋介石的政策，谈到Chiang Kai-Shek and his boys，其实他自己也在内。

1967年台湾经济发展会议结束，我要离开台湾前一天，突然接到蒋总统的请帖，宴请刘大中、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以及我。我因为要回香港和父亲团聚，所以没去赴宴。我那时候太年轻，居然总统请客也不赏光，实在不懂得处理事情。因为前一年（1966年）也是类似的情形，原来预定暑期班结束之后回香港探望父亲，临走之时突然去赴个重要人物的宴会，所以迟了两天才回香港。害父亲多盼了两天，他很不高兴。第二年我怕旧事重演，所以没去赴宴，直接回香港。回想起来，自己当年不会办事，如果换作今日，我会先打电话给父亲，告知临时总统宴客，可能耽搁一两天才回去。父亲一定能谅解，我也就可以去赴宴。随后蒋总统在梨山会见经济学者，采纳不少建言。后来我也忝为经济顾问之一，参与其事。

刘大中除了推动暑期讲学班、国际学术会议，另外还推动由中研院与台大合作在台大经济系设置经济学博士班。此后续一计划是由1967年台湾经济发展会议建议的。当时有人（例如Walter Galenson）主张这个博士班应设在中研院经济所，虽然与这个提案有直接关系的中研院王世杰院长、教育部钟皎光部长以及台大钱思亮校长都在座，他们却不便发言。在这个尴尬的情况下，邢慕寰先生便站起来向大家解释：「按照中研院组织法，中研院任何研究单位似无职权设置教学部门，所以把经济学博士班设在中研院经济所，将会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而在实际上，中研院经济所目前也没有单独设置博士班的条件。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美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院的支持下，由中研院与台大合作在台大经济系设置经济学博士班。」与会人员对邢先生的解释和建议稍加讨论后，即正式决定接受邢先生的建议。在这次会议后，中美双方代表曾数次就经济学博士班具体进行步骤交换意见，后来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国立台湾大学合作设置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由刘大中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从此台湾的经济学博士班就起步了。由于师资不足，必须从国外找人回来教



书。第一年请了Richard Rosett教授，他原来在罗彻斯特大学教计量经济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当商学院院长。

1970年我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在1966年首次被提名，那一年邢慕寰先生当选；1968年顾应昌先生当选；1970年才轮到我。每一届只有一位经济学家当选。1970年代我来台湾很多次，有时为了暑期讲学，有时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时为开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我也为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华经济研究院合办的中华演讲系列，邀请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Arthur Lewis与William Baumol在内。我的感想是当时政府对经济学者很重视。

## （二）担任政府经济顾问

1960年代后期台湾负责拟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是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严家淦是行政院长兼主任委员，李国鼎是经济部长兼副主任委员。经合会编列有经费，可以聘请外国顾问。1964年经合会副主任委员李国鼎邀请了刘大中、蒋硕杰担任经济顾问，1965年也邀请我，但那一次我错过了；接着1967年在梨山开会，与蒋中正总统会面，我也错过了，因为我急着去香港看父亲。后来1985年我回中国大陆担任经济顾问，也邀请其他的院士帮忙，1986年一月我先请费景汉去访问；同年七月邀请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三位院士；1987年邀请顾应昌；1989年三月又邀请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去香港开会。

1964年李国鼎想聘刘大中为顾问，大中无法来，他推荐我来当李国鼎的顾问。我们开始谈的时候，经合会比照我在美国的薪水，一年两万多美元，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本来说好1965年来台，因为美援在该年终止，需要对台湾经济做好准备。尽管待遇不算低，但是当时我还年轻，觉得自己发表的论文不够多，来台湾当顾问对于学术研究是一种牺牲，所以决定不来，宁可留在美国多写一些论文。至于1966年的暑期讲学班则可以考虑，反正只牺牲几个星期，于是答应和大中一起回来。回

来之后，大中拉着我到处拜会，政府官员如严家淦、李国鼎、张兹闯、徐柏园等人都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如果对方不在，只要留下名片即可，顺利多了。我要印些名片，大中建议我不用写其他的，只要「邹至庄」三字便可，此一建议我到今天还用。

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我的基本看法是台湾经验成功的理由大部分要归之于接受市场经济。政府接受并支持市场经济，给人民有赚钱的机会，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我相信蒋硕杰和邢慕寰可能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美国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 1950 年代许多国家都追求经济发展，失败者居多，所以政府如何引导经济发展成功，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其实政府不用多加干预，只要把制度建立好，让市场和人民自己去运作，制度要公平一些，给人民赚钱的机会。经济学家对台湾的贡献在于说服政府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台湾政府的功劳，在于他们比较开明，能接受经济学家的思想，其他国家则不然。至于其他的十大建设等，花了很多钱，反而有不少副作用，未必有成效。经济顾问团由刘大中担任团长，蒋硕杰次之，和其他的成员一起替政府做事，让政府官员了解现代经济学。

台湾政府对于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程度相当高，比美国高得多。1930 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战争才把就业率提高，所以战后有 1946 年的就业法案（Employment Act of 1946），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二次大战期间，战争提高了总需求，但是战后又怕再度陷入不景气，于是政府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设有顾问三人，建议政府刺激总需求。我最早认识的一个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是 Arthur Burns，他曾担任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的经济顾问。1951 年他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讲述自己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经验。甘乃迪（John F. Kennedy）总统时代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最吃香。雷根（Ronald Reagan）是最不重视经济学家的总统。他是个右派，是非对错全靠自己主观决定，很武断。他虽然没有学问，可是有些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意见。但是既然设有经济顾问，他请了 Martin Feldstein 担任，但事实上大概是既不接见也不听从顾问的意见。Feldstein 是个很自负的人，因为不受重用很不高兴，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外面乱发言。雷根总统对他很不满意，他只好回去教书。一般而言，美国总统不如台湾政府重视经济学家。

1970 年代台湾政府五人财经小组和我们经济顾问合作的经验，通常是我们到达台湾后的第一周，每天上午财经小组和我们讨论，指出当时台湾面临的经济问题，并讨论解决之道。下午我们自己继续讨论，一部

分是大家共同讨论，一部分是各自分工研究。有些经济问题需要资料分析，经济顾问们会费时两三个星期进行个别研究与共同讨论，之后提出研究报告，由大家分头撰写，再一起具名。如 1974 年的建议，我负责撰写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的部分。研究报告交给五人财经小组之后，再与他们讨论，有必要则进行修改。最后研究报告摘要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稿也事先让五人小组过目，有些不宜刊登的部分，则删去不登。但这只是手续而已，没有新闻检查的意义。因为如果他们有意愿，我们依照当时台湾国情，觉得研究报告之中有不宜刊登的部分，则进行修改，然后大家具名，由他们交给报社发表。

我们经济顾问六个人之间意见也不尽相同。刘大中先生担任领队时，他做得很好。他有自己的意见，但也听大家的意见，不坚持己见。有时候他也有很强烈的意见，但别人有道理就可以说服他。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专断的人。他很尊重蒋硕杰先生的意见，尤其是有关货币政策的建议，因为他不擅长货币问题。刘大中和蒋硕杰两位先生都曾在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任职。邢慕寰先生非常老道，他待在台湾的时间最长，住在台湾，熟悉台湾的情形，经验很丰富。我对邢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他有一年去芝加哥大学访问研究，其余大部分靠自学，非常不容易。他不但写经济理论的文章，也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念书非常仔细，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费景汉先生的意见常常和邢慕寰不同，但可以互相沟通，其他人则加以调和。顾应昌先生对农业、国际贸易等问题尤有见地。我们大家参与讨论，最后终能沟通，达成共识，六个人常常如此。讨论由刘大中主持，其余五个人发言时间平等，人人都有机会提供意见。1975 年八月十四日刘大中先生去世之后，1976 年起由蒋硕杰先生主持。我在为台湾做经济顾问的工作中学习到不少东西，这段经验对我的经济学很有帮助。

我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的期间，不觉得台湾有经济发展路线之争。政府各部门之间或有不同的意见，多基于单位不同，立场随之而异的缘故。例如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要推动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费，后来他担任财政部长，唯恐财政收支不平衡，于是拚命撙节支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过去我们来台湾担任经济顾问，多是由俞国华先生写信邀请。1980 年代以后没有人邀请我们，也就不再来台当顾问，我想大概台湾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当经济顾问了。

至于经济主管官员本身懂经济学，反而常有不听他人意见的情形，前述提到的 Arthur Burns 就是其中之一。Burns 后来出任（私立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的局长，1968

年他研究景气循环，所用的研究方法较老旧。他来找我和Geoffrey Moore三个人一起合作建构模型。Moore也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是Burns的副手，我在1972年出版了与他合写的一篇关于经济循环的论文。当尼克森（Richard Nixon）竞选总统之时，Burns参与助选，后来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出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1970 – 1978）。Burns自己是经济学家，所以不听别人的意见。联邦准备理事会设有研究处，在Burns的时期不太受重用。

1970年代我用控制理论来处理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将经济理论做成模型，再分析政策，我不是第一个如此做的人，如Jan Tinbergen（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Henri Theil等人早已写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书。但把最适控制理论应用在宏观模型上，我是第一人，这篇文章在1970年的*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上刊登。Burns去职之后，John Meyer继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他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拨给经费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用最适控制来做经济政策分析。从1972年到1976年之间，在*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期刊上，每年都有我和与会者的文章刊登，其中一部分就是开会时发表的论文。在19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用控制理论来做经济政策分析，连联邦准备理事会的研究人员也用。他们向Burns说最适控制如何如何，他听得都烦了。我和Burns的交情不错，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谈别的东西他有兴趣，就是不要提最适控制。可见自己懂得经济学的人，别人若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提供意见，他可能反而不愿接受。

1978年我和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五个人合写的〈经济计划与资源的有效利用〉一文，就是经济顾问交给经建会的报告。我研究经济问题，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则或缺经费，或缺人手，也很难把研究做好。例如同一项研究计划，若是别人主动请我做研究，则经费、人手、资料都很方便。如果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研究，必须认识对方的单位或人员，要自己联络等等，既费时又麻烦。所以研究兴趣与外在环境机会能互相配合，效率就能提高。

1996年四月康乃尔大学举办「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研讨会」，并纪念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先生。大会要求我谈一些当年与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先生合作的经过，于是我发表一篇文章“Economic advising in Taiwan.”，说了两三件轶事。

1958年刘大中去康乃尔大学任教，1959年我也去了那儿，我听说他曾支持请我去康乃尔任教一事。当时在学校只有我们两个人专门研究计量经济学，所以双方很熟，常常来往。三年后我离开康乃尔，去IBM公司任职。他推荐我来台湾当李国鼎的顾问，皆缘于此。大中的优点很多，我向他学到不少东西。他的缺点是做事很强硬，有时会得罪人。所以他的好朋友很多，但不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孙运璿当经济部长时，有一次请我们去开会。大中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不去开会。我坚持说人家需要我们帮忙，应该要去，终于说服他去开会。我会劝刘大中不要得罪人，我的太太Paula（陈国瑞）倒也常劝我不要说话太直得罪人。

蒋中正总统年纪越来越大，后来我们经济顾问都见不到他。由蒋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费骅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是他的左右手。有一次蒋经国宴请我们，说蒋总统要他问候大家。刘大中要给蒋经国先生一些建议，用餐完毕之后即席在挂起的图版上，画出需求、供给曲线，讲了25分钟的经济学原理。我看见蒋经国先生不太高兴，会对大中印象不好。大概大中曾经给蒋中正总统上过类似的课，而且奏效，所以对蒋经国也如法炮制。殊不知蒋中正总统年轻之时，曾在上海接触过金融业，所以懂得其中的道理。而蒋经国是留俄的，他对这一套完全不懂，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另外有一回也是蒋经国先生宴请我们。当年因为实行以保证价格收购稻米，订价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农民拼命种稻。当天报纸已经登载说明此一保证稻米收购价格，是蒋经国决定的政策。但是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补贴政策是不好的方法，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宴会时蒋硕杰先生坚持不能做，蒋经国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果然第二年稻米大丰收，供过于求，政府的米又卖不出去，收购的稻米无处堆放，只好堆满篮球场上。后来采用限量收购的办法才解决此一问题。

1970年代经济学者都认为政府给裕隆汽车过度保护是不对的。当台湾刚开始创办汽车工业时，有保护幼稚工业的主张，我建议应该要有保护期间的限制。保护措施一般有三种：（1）关税：设定时间表，汽车进口税逐年降低。例如汽车进口税率第一年为150%，第二年降为100%，第四年以后降为50%，第六年以后免税进口。（2）营业税：对汽车工业减税，以鼓励生产。（3）津贴：由政府提供资金补助汽车工业，逐年降低补助额，以利于和外国竞争。我觉得虽然补贴因为经费问题较为困难，但人民因此有便宜的汽车可用而受益。几位经济院士都同意不要长期保护的建 议，但政府基于政治考量未采行。裕隆汽车工业的发展不包括在政府向经济顾问提出的议案，而是属于关税项目之下。新加坡的

汽车关税也很高，采行以价制量的政策，一部在美国值两万美元的汽车，在新加坡的售价是五倍，约值十万美元。不过新加坡与台湾的考量不同，它自己没有汽车工业，不生产汽车，所以用意不是特别保护某一企业，它是为了避免汽车过多，阻碍交通。我参与大陆经济改革之时，有些政策从经济角度考量是好的，但是把政治压力考虑在内就不成了，例如必须考量干部的思想倾向，他们对某种政策能否接受，所以经济政策必须具有政治可行性才行。

### （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在台湾担任顾问工作的经验，使我对经济学和实际应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与大中、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诸位先生，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即使大家原先的意见并不一致，但都一心为公，彼此之间的讨论很开明，没有偏见，逐渐沟通。有如一个团队（team）的合作，不逞个人意气自我辩护。我们好像是一个代表国家的篮球队，不看个人得分，而是看整个球队的总得分数。

1980年代我去大陆担任经济顾问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我很愿意找海外经济学者参加，也和当地学者、官员交换意见。我对现实的经济问题很能把握，反应相当快，这要部分归功于当年在台湾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帮助。

我也邀请海外经济学者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1986年一月我和费景汉先在香港和体改委会谈，同年六月我和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四个人在北京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讨论，每天从早到晚，大约进行四、五天。会谈进行的方式是他们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四个人和他们一起讨论，和台湾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时间自己做研究，就和他们直接讨论，虽然在会谈之前，他们事先会准备资料和问题。我们之中亦有人建议，四个人一起先在美国开会讨论，但实在凑不出时间。

比较在台湾和大陆担任经济顾问的情形，两岸的政府官员和顾问们互相交换意见都很开通，双方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是共产党员，我个人对于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偏见。记得胡应湘曾经说过：「我去了大陆好多次，从没见过一个共产党员。」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官员与刻板印象中的共产党员扯不上关系。有些中国共产党员曾做过很坏的事，现在改变作风，我能接受。

我在 1994 年的书中提到，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对大陆经济改革影响很大。大陆的经济改革部分学台湾，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功，大陆不会如此热心积极推动改革。邓小平有「实事求是」的最高指导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心想既然人家台湾做到了经济发展成功，我们大陆当然也能做到。比较台湾和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有下列四个共同之处：（1）经济改革都是从农业部门出发。（2）对外开放鼓励出口。大陆比台湾开放得更快，幅度更大。例如台湾对于裕隆汽车工业的保护长达几十年，不准日本汽车进口。大陆开放日本汽车进口的速度很快，1984 年我在大陆旅游，已随处可见日本丰田汽车。（3）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和计划管理逐渐减少。例如台湾的尹仲容一开始也是什么事都管，后来慢慢改变。（4）重视控制通货膨胀。虽然双方都有通货膨胀，但情形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受到 1940 年代大陆恶性通货膨胀经验的影响。1995 年前后大陆物价控制得很好，部分是沿袭台湾的同一政策。通货膨胀也已逐年降低，从 1994 年的 21.7% 降到 1995 年的 8.3%。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也相当稳定，1990 年代一元美金兑换八·三元人民币，持续几年没有变动。

1990 年代后期台湾与中国关系紧张，大家最瞩目的焦点是辜汪会谈。两位主角辜振甫和汪道涵都是适当的人选。1966 年我来台湾讲学，首次遇见辜振甫。他担任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邀请我去演讲。我的讲题是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亦即用数量方法进行工业及其他的管理，例如如何控制与调节经过隧道的汽车交通等问题。辜振甫好几次邀请刘大中去他家里唱戏，我也参加。他是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能代表台湾企业界与中国商议合作的条件。我对汪道涵的印象很好。1984 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我在北京举办微观经济学研讨会后去上海，由他负责招待。我们从下午三点开始谈话，直到晚上共进晚餐，同时在座的还有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我的太太 Paula 等人。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包括一般性的问题和经济发展等。汪道涵很健谈，脑筋也很清楚。

后来我再去上海好几次，也见到他。其中有一次在 1988 年秋天，因为教委（国家教育委员会）要编新的经济学教科书，找外籍教授来讨

论，我去参加，总共在上海进行了三、四天。会中讨论如何编写经济发展用的教科书，要讨论大纲、内容等。我认为他们应该多利用台湾的教材，这些书台湾都有，而且专有名词也已译出。我猜想他们可能参考过。另外有一次在 1993 年夏天，我率领普林斯顿校友到中国访问考察。经过上海时，汪道涵请我吃便饭。席间他问我是否有 Joseph E. Stiglitz 的教科书，他想找来看一看。我到香港之后便替他购买。1990 年代汪道涵也担任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的名誉董事，开会时常常见到他，1996 年一月开会他也出席了。我们见面时没有谈和台湾合作之事。汪道涵有办事经验，在国内也有地位，很适合代表国内与台湾共商经济合作。

2002 年我想促成汪道涵去台湾，可惜没有成功。1998 年十月最后一次的辜（辜振甫）汪（汪道涵）会谈，先在上海举行，会后辜振甫率团赴北京会晤江泽民等人。本来隔年应该是汪道涵来台湾访问，但后来因为李登辉说台湾与大陆是国与国的特殊关系（state to state），大陆不能接受，所以这个会谈就办不成了。

2002 年中央研究院举行院士会议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知名的企业家宴请我们，他希望我们帮忙促进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流。院士会议结束之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就离开台北。我在机场看到新闻报导，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率领一个两岸三通访问团去上海访问，汪道涵示意希望有机会要继续改善和台湾的关系，说了几句比较正面的话。我回到普林斯顿，马上打了一通电话，问这位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由他出面，邀请汪道涵来台湾，名义是来台湾参加一个经济发展讨论会，我可以主持这件事情。这位先生的头脑转得非常快，（他不愧是台湾的人才。）几秒钟以后，这件事情他已经考虑清楚，立刻同意，不过如何筹备经济讨论会他没有经验。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会去办。于是我请他写封信，用他的名义邀请，由我转交给汪道涵。他做事很有效率，第二天信就来了，用传真寄给我。我收到信以后，就把那封信转给汪道涵的私人秘书，可是汪道涵没有回信。大概过了十多天，我再给先生送了一个传真，说我已经把信转寄给汪道涵，但是没有收到回信，要不要再催一下，探询看看。先生说不必问了。这件事情就到此告一段落。

院士会议是七月的事情，到了十二月，我去广州参加岭南学院的董事会。汪道涵也是岭南学院董事会的名誉主席，这两年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没有来参加，过去四、五年他常来出席，但那一年却没有来。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朋友，朋友说他去帮我打听为什么没有回音。第二天上午开董事会，中午结束之后，朋友的司机送来一封信署名转交给



我。信上说我提议要促进两岸关系，用意很好，但是在台湾没有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这件事行不通。后来我把这封信传真给这位先生，对我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他已尽了心，我也尽了力。2005年十二月汪道涵就过世了（辜振甫已先于同年一月去世），辜汪会谈终究没有再办成，非常可惜。

至于汪道涵或中国当局会不会出于政治敏感的考虑而对这件事有所保留？顾虑本来是辜汪会谈，现在怎么变成汪道涵和别人会谈呢？老实说，我连这点都没有想过。而且以先生在台湾的地位，他并不需要以汪某会谈取代汪辜会谈这样的名声。我并不知道他的想法，只是单纯因为辜汪会谈办不成，于是我想促成汪道涵的台湾之行，邀请他来参加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是辜汪会谈以外的非官方会谈，辜汪会谈则是官方的会谈。即使非官方的研讨会能请汪道涵来台，也是好的。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在香港、中国都有很多朋友，也关切中国和台湾两地的发展。包括来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同时也和有些台湾朋友一样关切台湾未来的问题。

## 四、推广中国经济学教育

### （一）一九八〇年重返中国

1978年十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夏天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之邀赴北京讲学。这次讲学是由宾州大学的Lawrence Klein筹办，成员包括刘遵义、Theodore Wilbur Anderson、Albert Ando（宾州大学）、萧政、粟庆雄等几位计量经济学家。我是其中之一，也是离国三十二年之后首次返回中国大陆。在北京每人各授课一至二周，前后持续数周之久。授课内容辑成《计量经济学讲义》出版。我的主要教学内容一部分是普通计量经济学，其他则是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后两项是我的专长课题。Anderson则教数理统计。我用中文上课，若是外国人则用英文，另有翻译。

1980年夏天我总共在大陆停留三个星期，其中两个星期在北京，最后一个星期到上海、西安、昆明等地旅游。我在上海听了京戏，印象非常深刻。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后，我到台湾去，刚巧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璿夫妇也邀请我和Paula去听京戏，我向他称赞上海的京戏很好。

在北京的讲学是由中国社科院主办，在颐和园上课。学员约有一百人，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颇高，多在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甚至有高达六十多岁者，三十多岁就算很年轻的了。这是因为在文革时期（1965-1975）大陆都没有培训青年学者。可能因为是多年来首次的中外经济学交流，他们都热切希望听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争相参加。当时到中国旅游的外国学者时间都被排满，多次讲学，是很普遍的现象。

1980年我第一次回国时见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他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和他谈中国经济，提出市场经济的看法，主张企业应该拥有自主权，用计划方式管理企业是行不通的。他相当开明，表示大致同意我的说法。九月初我返抵美国之后，在纽约时报第一版读到姚依林八月三十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曾宣布扩大

企业自主权，和市场竞争，把经济搞活。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和他会面之时，他已有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想法。

马洪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后升任院长，再任职国务院，住在中南海，担任顾问之职。他与前后几位总理如赵紫阳、李鹏等人关系不错。马洪曾主持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毅夫于 1986 年学成返回大陆之后，曾在此研究中心任职。此外，我还见了于光远与后来升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

1980 年刚改革开放不久，我初次回去，对他们进行的改革所知不多，只知道有农村改革。国家物资供应局请我去演讲，他们请教我如何运用作业研究，使分配灵活些。我告诉他们必须要用市场供求方能解决，用数学方程式来解决是做不好的。

去国多年之后重返大陆，我感觉国内仍然相当紧张。环境不太好，我住在友谊宾馆，既脏也不舒服。浴室的地板总是不干净，有些外宾只好买沙粉自己动手刷洗。有亲戚到北京来看我，不敢在房间内说话，出到花园才敢说。友谊宾馆是招待外宾之处，我有一次穿着和当地居民差不多，就被误认为北京当地人而不让我进入。当时北京的饭店均如此，为阻挡当地人出入，门禁森严。

当时大陆物质环境差，北京天气又热，匆匆忙忙开课，没有更好的地方上课，只好在颐和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被安排住在颐和园，上课时没有冷气，房间又挤。他们通常安排我上完课之后，乘汽车回友谊宾馆用午餐。我要求下课之后与学员共进午餐，主办单位不同意。可能考虑我吃不惯他们的伙食，需要准备。只有一次我终于得以和学员一同用午餐，食物与同桌的学员都经过特别安排。餐后我正想和他们互相交换意见，那知大家午餐后要睡中觉，无法聊天，共餐的主意以后只得作罢。

1980 年的中国还不是商业社会，旅游并不方便，我到各地旅游都透过社科院安排，他们在各地有分院负责招待事宜。我在他们建议的五、六个地点中选了几处，广州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从小在那儿长大。我们夫妇与 Anderson 夫妇结伴同游上海、西安，受到极好的招待，住宿与听戏的座位都是最好的，坐在头排居中的位置。离开西安以后，Anderson 夫妇不再同行，招待就差了一些，住宿与戏票虽然还是不错，但已不是最好的，不再坐在头排了。

我的母校岭南大学在 1952 年撤废私立大学之时已被并入中山大学，但有些旧日的老师和同学仍在。有些老同学已成为教授。广州社科院的副院长金应熙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负责招待。他从事历史研究，当年我还是学生时，他已是左倾学者，在文革之时受了不少苦，当时知识份子均如此。我和他在旅馆谈至深夜，我说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好东西，但他认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而是人谋不臧，实行的方法不好，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后来这些年我的想法也有一些改变，现在觉得市场社会主义也有相当的道理，是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首次回国虽然是贵宾身分，处处有招待，心理上仍然很紧张。离开大陆时，从广州搭船到香港大约要三个多小时，走水路比较舒服。因为我的太太Paula同行，亲友致赠礼物不少，行李过重，需要多付外汇券五元。我身上没有五元外汇券，倾其所有，将二元人民币和三元外汇券杂凑出五元，但是检查行李的干部不肯接受，他只收五元人民币或五元外汇券，我必须到一条街以外的银行去兑换。我深怕付不出钱，赶不上搭船，幸好替我送行的亲友尚未走远，我才用三元外汇券和他兑换三元人民币（外汇券可以购买进口商品，比人民币值钱），解决了难题。直到船出海之后，我紧张的心情才真正放松下来。Milton Friedman在我之后七、八年去中国访问，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才觉得自由了。我觉得收费员很官僚，但事后想一想，他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外汇券与人民币价值有差异，他怕别人误以为经手之时，他私下兑换图利，所以收款之时必须要求同一币别。

在大陆旅行时，另外一个深刻的感受是飞机不守时。例如我从西安飞到重庆，要转机去昆明，在机场候机。班机临时取消或更动时间也不通告，我们不知飞机何时起飞，只能苦苦等候。一下子宣布要起飞了，我们全都跑过来，等一下又不飞了，再回去等候，数次跑来跑去。这种不能控制的环境，令人感觉紧张。1980 年以后许多初次回国的人，见到国家情况如此糟糕，许多亲人受苦，深受冲击，心里错综复杂的感觉持续好几个月。其实 1980 年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几年，比起 1976 年毛泽东刚死之时最坏的情形，已经好多了。

我在 1948 年离开中国大陆，我们这一辈在 1950 年之前出国的人，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时，印象极为深刻。1980 年我首次回国，我的太太Paula是上海长大的，回上海去看她的老家。那是一栋大房子，现在是别人住在里面，以前一家人住的房子现在则有五、六户人家，每一家住两间房，又脏又旧，感觉很不好。回去她昔日念书的学校一看，已经变成上海社科院的一部分。上海原本非常繁荣兴盛，现在举目所见一片残

破，连粮食也不足，令人很伤心。中国搞了几十年，只落得比从前更坏。一位朋友说不知何时上海才能恢复昔日的繁荣。亲友设宴款待，即使在招待贵宾的饭店，水准还是很差。在北京，饭店供应的苹果已经烂了一半，根本不能吃。北京著名的饭馆，很多都已不会做菜，少数还维持的，水准也很差。我们到颐和园去吃名筵，从前厨艺可能很好，现在变得很差，名不符实。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退步了，水平很低。只有两个方面有进步：一是医药方面，穷人也能就医，死亡率大为下降；二是教育普及。因为有统计数字可稽，所以可以采信。虽然当时中国情况很糟糕，可是充满了希望。特别是几位后来与我合作共事的人，如王复孙、王泽农，乃至赵紫阳，大家都有心希望改进，值得我帮助。而且从经济效益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自己在大陆所做的工作很有效益，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

## （二）一九八二年中国之行

由于 1980 年回去中国的机缘，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纷纷邀请我去演讲，想学更多东西。1982 年我应邀到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六所大学演讲。这次是由个别单位邀请去讲学，与上次社科院统筹办理的情形不同，我这才发现两地之间的交通行程安排困难，极不方便。第一站我首先到中山大学，系主任请我去演讲，我要求先看场地。管理演讲厅的工友态度很不客气，大刺刺的向系主任要求看申请文件证明，问何时登记的，系主任答说一个星期之前，恳求了好半天，最后终于开门让我们看了一下场地。对我这个外来的人而言，这是很新奇的经验。中国这种财产管理权影响经济行为的现象，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分析。在中国财产属于国有，但需要人来管理，例如直接管理房屋的人因为拥有钥匙，所以权力最大，可以利用职权要求使用者给予好处。再如 1984 年我在北京主持暑期讲学班，教委拨派一部汽车供我们使用，司机的服务态度很差，我就骂他，并且向主管单位反应。教委的朋友也只能向我道歉，说他们自己也管不好司机。这种情形可能持续下去。

第二站是武汉。我必须事先通知对方接待单位何时抵达。我有一位老同学是中大教授，负责招待，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派了一部面包车给我，两个人进出使用很方便。我想打电报去武汉告知我的行程，他说我不要自己去，但我坚持亲自打电报。原来打电报必须去邮局，进了邮局，我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大家都不排队，要挤进去必须打架。最后还是我的同学有经验，挤进去帮我打了电报，很不容易。我在武汉大学由外事处招待。按照惯例，大学都设有外事处负责招待外宾，外事处手上拥有预算，权力很大，连校长都要向它低头，俨然主人一般。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和外国大学的情形很不一样。武汉大学外事处负责接待的人，后来和我仍有联络，每年圣诞节都会互寄问候卡。从武汉搭船经长江三峡到重庆，是由外事处张罗。然而因为买不到船票，耽误了一天的行程，抵达时间已晚，原来安排在重庆的演讲也因此取消，让一百多人空跑一趟，随后我就飞往北京。

在北京讲学时，负责招待的是社科院院长马洪。赵复三先生是副院长兼管外事处。从 1981 年起，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了与中国经济学交流的委员会，我当主席，共十三年。1982 年到 1994 年间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五月版刊有每年的年度报告。这项学术交流初期由中国社科院代表中方，是副院长许涤新出面，美方则由我代表。中方代表团有十人，于 1981 年到华盛顿访问，由我代表欢迎。赵复三早年在上海念教会学校，英文极为流利，每次都随许涤新前来。代表团到了普林斯顿，我请大家到家里吃饭，赵复三曾在我家谈天，我当他是朋友。后来有人提醒我，此人行为难测，要我小心提防，这次北京之行便有一次经验。

事情原委要从 1980 年在 Rutgers 召开的亚洲经济会议说起。后来担任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编辑的 Jan Dutta 想邀请亚洲各国派代表参加，请我提供名单。台湾方面，我邀请蒋硕杰、郭婉容；大陆方面则是张培刚、林少宫。张培刚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曾参与武汉市市政，他是国内留美学者之中最好的人才。林少宫则是伊利诺大学的博士。台湾和中国双方的人员不在同一场合碰头，中国反对台湾使用「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的称号，蒋硕杰和郭婉容两个人就在会场自己摆出「Republic of China」的名牌。其中有一场讨论会，我是主席，郭婉容是第一个报告人，张培刚第二。郭婉容首先报告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张培刚随后报告，他首先发表一段评语，大意是说他很高兴听到台湾经济发展成功，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郭婉容后来发言反击，说：「台湾是中国自由和民主的一部分。」张培刚想再还击，刚一开口说：「台湾.....」，

就被我打断。我说：「身为主席，我必须阻止大家。」张培刚话说一半被我打断，此事有人到领事馆打报告回国内。

1982年我到北京，赵复三和社科院的温志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来看我，先是讨论中美经济学交流之事，后来温院长离开了。我住二楼，临走时送赵复三下楼出去，那知他突然警告我在Rutgers开会之事被打报告，说国内有人批评我。我很不高兴，回答说：「在美国开学术会议，台湾和中国两方面我都邀请。如果中国不高兴，以后不要参加算了。」我当晚睡觉时，才想起这是回美国之前的最后一天，万一他居心不良向上面打报告，或说我是美国间谍，说不定就走不成了。我自担了一回心，直到上飞机后才完全放松了。赵复三后来趁着去法国的机会，滞留在法不回中国。

我在社科院演讲了两三次，在座有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陈立。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有计划经济学讲座，我便邀请陈立来教数周的课程。以往中国即使在1970年代最糟糕的时候，仍然卖力表演，展示最好的一面给外国来的访问者看，所以美国人的印象一直认为中国很好。我在1980年代初期曾和Alan Blinder辩论，说中国并没有这么好，内部有许多问题存在，他认为我是代表保守派的国民党份子。1980年代美国一般知识份子还是迷信中国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普林斯顿大学自不例外。1983年陈立来教中国的计划经济，讲大跃进的种种缺点，学生都不相信他的说法。

1982年我第二次赴大陆讲学，前后约二至三个星期。同年十二月我应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院长之邀来台。适逢蒋先生的夫人赴美，他雇了一个同样姓蒋的佣人，兼开车的司机和烧饭的厨子，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除了演讲之外别无他事，开始着手写《中国经济》（*Chinese Economy*）一书，以帮助自己了解中国经济的问题。我想写一本给中国学生用的教科书，介绍现代经济学给他们。我希望用这本书来解释中国经济，而不想用Samuelson的经济学教科书，因为他的书中讲的是美国经济。「现代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我开创的，在中国本来都说「西方经济学」，我说：「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也是西方人，这个名称不好，应该叫做现代经济学。」写书的进度很快，1983年一月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写好大纲，1983年九月全书完成，1984年底之前已经出版，但这本书挂名1985年出版。出版业者惯于将年底出版的书挂名次年出版，其中道理和汽车出厂年分相同。我在1996年年底出版的书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也是挂名1997年出版。

### （三）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

#### （1）缘起

我和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结下机缘是很凑巧的事。1983年十月大陆教育部高教司派两位代表王复孙和王泽农到美国来。王复孙是高教司外事处的主任，王泽农则是高教司之下负责法律、经济教育的处长。这两个人非常能干，肯做事。他们原来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法学院的 Randy Edwards 教授，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法律教育，希望在中国设立法律教育讲学班。他们也到普林斯顿大学来，我和他们并不相识。我的朋友 Judy Bullitt 女士协助 Edwards 教授做事，她也住在普林斯顿。她说有一个中国代表团要来访问，请我安排。我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员，从 1979 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双方重新恢复来往，美国经济学界要接待中国来的人的时候，都是由我招待。例如 1980 年代有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中国代表团来的时候，我要代表美国去欢迎他们，所以我常去华盛顿。后来我觉得从中国来的人太多，招待不来，很多时候就找机会推辞。我怕见中国代表团，光是接待许多代表团就把时间耗尽了，所以没有什么兴趣。但因为 Judy 是好朋友，我只好答应了。她特别说明这个代表团和其他假借名目来观光旅游的代表团不同，他们很认真做事。我的太太 Paula 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主任，她帮忙打电话找威尔逊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的行政人员安排接待。

1983年十月二十日校方请这个代表团吃饭，我原来并不想去，因为那天晚上正巧没事，加上太太之劝，于是就去赴宴。这一去被王复孙、王泽农两人拉住，要我协助推动经济学教育。后来在家里详谈，我答应主办暑期教学班，教授经济学的三大门基本课程：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预定在 1984 年教微观经济学，1985 年教宏观经济



学，1986 年教计量经济学，分别进行，经费由大陆教育部负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名词，即出自 1984 年在北京举办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在台湾，两者分别译作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

王复孙很能干，做事效率很高，他负责筹措经费。但是 1984 年一月他写信告诉我找不到钱，暑期讲学班只得作罢。有一天，政治学教授 Leon Gordenker 在我家吃饭，我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太重要了，建议我自己想办法筹经费。我听了以后想一想，筹钱其实并不难。我在美国经济学会之下，曾出任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的经济学代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包办与大陆学术交流之事，此机构到 1990 年代中期尚存，可是已经没落了。它算是一个民间组织，但与政府有关系。许涤新率领访问团来美之时，美国经济学会没有接待经费，都是由它支付费用。它鼓励美国教授到大陆讲学，诸如签证等行政手续必须透过它办理，此外还负责谈判、协调等工作。我和他们很熟，再加上学术交流素无大事，去中国开经济讲学班是一件很重要而且有价值的事，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会有兴趣支持，于是向他们申请经费。但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回信拒绝。我后来托了委员之一的朋友打听未获批准的原因。在 1994 年的书中我叙及此事，只简单交待说向「美国的基金会」和「可能有兴趣的机构」申请经费未成，前者是指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后者即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原先我想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补助，由 Mary Bullock 总管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福特基金会提供很多经费，做为和中国学术交流之用。我知道他们有经费，就向 Mary Bullock 说：「你们有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可以补助我们一些吗？」Mary Bullock 主管的钱是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福特基金会竟然反对。后来才知道是 Peter Geithner 反对，不让我们进行培训班的事，他想要我们透过他的管道来做事。

虽然这些机构不核准经费，但其实办讲学班不用花多少钱，即使只凭我自己的力量也做得成，他们不资助经费并没有阻止我。早在 1981 年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曾和复旦、北大两个学校建立关系，并签有相关的合约文件。最后我去见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William Bowen。我早上九点半打电话要求和校长见面，十一点十五分见到了 Bowen 校长，大约谈了十五分钟左右。他当天就同意支持我的计划，解决了经费的难题。Bowen 做事非常有效率，后来他任职美隆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普大支付每人飞机票和两千元美金，连我自己一共八千元美金。不过，我们的培训班开始进行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想来参加，后来我还是和福特基金会合作。从 1985 年开始，福特基

基金会每年提供九十余万美元的经费，举办经济培训班（Economic Training Center）等项目，所以在中国一般人直接简称为福特培训班。

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场合，双方都可能出问题，但中、美两国的情形各不相同。第一、中国国内不能竞争。中国的决定权都在教育部手里，教育部说要给谁就给谁，其他学校没什么话可说，各单位可以向教育部提出要求，但不能用彼此竞争的方式。第二、美国的情形是福特基金会不让我进行。这个问题出在福特基金会，Mary Bullock 主管一般性的经费用途，她可以决定用在任何一个项目上，但福特基金会却说不能在我这个培训班的项目上。原因是有人想争取主导权。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活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交流都经过这个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我是其下代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主席。该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由 Mary Bullock 主管，她同时也在普大威尔逊学院任职（Director of the Asia Program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88-1995）。

## （2）一九八四年

我所写的《中国经济》一书，1984 年初 Haper & Row 出版公司经过几个月的审查之后，已经决定出版。我又正巧在 1983 年十月答应高教司主持 1984 年暑期经济学讲学班。这两件事时机配合得正好，实在是运气。我想用这本书做为教科书，来改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到中国的大学里教书正好可以派上用场。1984 年六、七月，我在和教育部合作主办的讲学班上第一次使用初印好的散装版当做讲义。当时我想在大陆出版这本书，讲学班的学员中有一些北大、清华的人来听课，他们的学校都自设有出版社，起初也有意出版，但是仔细看过内容之后，可能发现书中有一些想法和他们的官方说法不符合，所以不方便刊行。

1984 年七月五日我第一次见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要的谈话内容有两点：一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二是经济改革。我提到自己写了一本书，用现代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他立刻说一定要翻译成中文，我说已经有中译本，他马上接着说应该要出版。两三天之后，我应邀到南开

大学演讲，校长滕维藻可能得知赵紫阳的指示，就和我洽谈出版事宜，所以这本书最后由南开大学于 1985 年出版，在国内销售。教委选派留学生出国读经济学的考试题目也就从这本书中取材，所以这本书成了留学考试必读的教科书，很多在中国念经济学的人都读过。这本书在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因为时间配合得刚好，赵紫阳的指示和选派留学生出国二事也是适逢其会。

1984 年秋季开始选考留学生，重点大学都分配有名额，各校多寡不等。例如北大和复旦大学各 10 名，浙江大学只有 1 名。各校先自行考试筛选，最后共约 165 人参加，1984 年底录取 81 人。我安排了其中 63 人出国留学。

1984 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一日暑期讲学班经过考虑之后决定用英语上课，王复孙决定不用翻译。从全国各地找了四、五十人来上课，因为当时既懂英文，又念经济的人不多。后来出任岭南学院院长的舒元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已是助教或讲师。这一班学员都很用功，表现良好。师资方面，我邀请 Sherwin Rosen、Edwin Mills、Marc Nerlove 三位教授担任。Rosen 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Mills 擅长都市经济学。教授们得到的待遇是旅费两千美元，讲学报酬每人两千美元，教两个星期课，另外由教委招待每对夫妇生活费和旅游一个星期。由于待遇不高，我只好拜托朋友帮忙。三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各人想法不同。其中有一位教授有点难对付，他原先答应要去，临行前一个星期突然改变主意，大概是想谈条件，不外乎想少教些课或是多拿点钱。我告诉他大家待遇一致，不能破例，即使我自己身为主办人，待遇也相同，没有另收筹备费与行政费用，最后他还是去了。我主持中美经济学术交流多年，常聘请外国学者去中国，也常碰到有人想要讨价还价，对处理这类事情有些经验。

我抵达北京之时，王复孙、王泽农来接机，当晚教育部长何东昌设宴款待，在座有高教司副司长夏自强。有些中国人乃至美国记者，喜将政府官员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他们把何东昌归为保守派，许多留学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他在教育部长任内好几年，我和他合作很顺利，他并不如外界所说的保守。例如我们谈到岭南大学复校之事，我是岭南大学的学生，有很多校友都希望能复校。何东昌说教育部基本上不反对，只要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和广东省教育领导赞成，复校案送到北京，他也不会反对（详后〈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84年的讲学班设在北京，居住的条件仍未改善。外国教授住在北大的勺园，有一房一厅和浴室，热水限时供应（南开大学外事处的招待人员曾自夸服务优于北大，因为他们是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很简陋。外国教授虽然不习惯，教书都很卖力。一星期上课六天，从九点到十点半，每次一个半小时。课后我和同学们谈论课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其他教授各教两个星期，我自己则待六个星期。上课时，我和同事之间常交换意见。下课后，我也和学员聊天。后来有学员告诉我，我去听其他教授的课很不妥，显得自己没有学问，很没面子。我觉得这种观念没有什么道理，听别的教授讲课在国外是很平常的事。后来我在岭南学院邀请外人来演讲，就推动教师去听讲，开风气之先，因为教师进修，学生可以受益。

这次讲学班期间，主办单位派了一部车给我们，司机很不听话。有一位外籍教授的太太，可能因为出国经验不多，对付不了司机。我出面干涉，才知道司机不好管，这是财产公有制之下的恶果。相较之下，1984年的中国比1980年进步很多，但生活水平仍然很低。我在北大勺园住了六个星期，校园里有一个小湖，景致很美（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后变为北大校园）。我早上在校园散步，和学生聊一聊。碰到学经济的学生，问他们念些什么书，有些书真是全无用处。

1984年讲学班结束后我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与汪道涵一同招待我，邀请我去复旦大学公开演讲，讲题是我当年喜欢讲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介绍经济学的观念。我发现复旦大学学生较北大活泼得多。我在北大时，有一位陈岱孙老先生曾与蒋硕杰先生在北大共事，比蒋先生年长。1984年他已八十多岁，仍然每天上班。我演讲时，由他担任主席。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年纪大的先生，年轻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发问。复旦大学就不同了，年轻的研究生、讲师都发问，而且问题很尖锐，也不管年长的前辈先生在座。我觉得这与谢希德校长的作风有关。她鼓励学生要敢说话，形成学术风气。她是麻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在1950年代初期返回中国。她走路不太方便，是因文革时被害受伤的。1996年为了庆祝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我在香港筹办「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研讨会议」，请她演讲，她讲得很精彩。

我到杭州之后，由浙江薛省长招待，和他谈了不少。我也去参观浙江大学。我们游完西湖之后，去黄山玩，再去广州，由广东副省长王屏山代为招待。次日，他又以岭南大学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再招待我一次。中山大学校长李岳生是一个数学家，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我在大陆见过好几位大学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南开的滕维藻、中山的李岳

生、人大的黄达、复旦的谢希德等，他们都很能干。大陆共有三十五所重点大学，校长由教育部派任。其他数千所高等学校的校长则不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学苏联，如工业、铁路等部都设有大学，培养训练干部。例如交通大学即与铁路有关。美国只有矿业局（Bureau of Mines）在科罗拉多设有学校。此外，大陆各省也都自设有大学。重点大学校长的产生，先由教育部组成委员会到各校访问，经多数教授投票选出，再由教育部派任，相当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就不同了，虽然也有一个校长遴选委员会，教授可以提供意见，但没有投票权，校长由董事会派任。

### （3）一九八五年

1985年我主办宏观经济暑期讲学班。这一年中国教育部升为教育委员会。在大陆的行政体系中，委员会比部高一级，如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体制改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都有很大的权力。我觉得一年之间学生素质有很大的变化，英文程度提高了。

宏观经济讲学班的上课地点也改了，从前一年的北大搬到人民大学。人民大学主要是训练干部，从前的师资多曾在苏联留学。我请了William Branson、Dwight Jaffee、Richard Portes、John Taylor四位教授，连我一共五人，上了六个星期的课。

这一年的暑期班，学生人数较多且程度也好。这是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第一期，经费较充裕，招待教授住在西苑饭店，靠近人民大学。西苑住房很干净，餐厅也不错，我很满意。暑期班结束之后，我们去黄山、上海等地旅游。1984年以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人民大学都聘我为名誉教授，这只是荣誉职，他们希望我有空时可以去讲学。

### （4）一九八六年

1986年我主办计量经济学的暑期讲学班，邀请Richard Quandt、Angus Deaton以及Robert Engle三位教授来上课。Quandt教授先来，他和我住在西苑饭店。等到Deaton教授来的时候，西苑已经没有空房，只好住到友谊宾馆去。他很不高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如我和Quandt，临走之时还在抱怨。他是我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但对于这件事不能原谅我。其实住宿的问题是由教委负责，但是它也有难处。大陆开放之后，去旅游的人日多，旅馆房租日贵，政府受市场经济影响想将西苑出租多牟利。由于两方主管单位不同，教委权力管不到西苑饭店而要不到房间。我只能向Deaton教授抱歉。

这一年我除了主办暑期讲学班之外，同时还邀请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几位海外经济学者与体改委会谈，也是在北京开会。与会经济学者都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于是我决定把西苑的房间让给Deaton教授住，自己去住北京饭店。后来Deaton教授离去，我在西苑的房间便空出来，但我仍然保留这个空房，等于是我一个人同时保有两个房间，从资源使用的观点而言，这种做法是很不经济的。但是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不用花自己的钱是其一，唯恐以后有需要之时要不到房间是其二。因为这里不是市场经济，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东西。我因此才明了何以中国企业存货很多的原因，因为生产所需的原料是由中央分配，而分配靠不住，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多要一些，当成存货以备万一，也因此造成资源浪费没有效率的现象。

我和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四人与体制改革委员会谈体改之事，讨论数日后，赵紫阳设宴款待我们四对夫妇。席间他得知我们将要去台湾，还特别要我们代为问候副总统李登辉和行政院长俞国华。

## (5) 其他

我先与教育部合作开办暑期讲学班，1985年以后教育部改为教育委员会，双方继续合作。除了暑期讲学班之外，另外在1985年初由福特基

基金会提供经费，建议成立委员会，对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一年的长期经济学培训班。福特基金会支持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它主要的工作是教育和研究。由 Dwight Perkins、Robert Dernberger、D. Gale Johnson、Lawrence Klein、Lawrence Lau、Herbert Simon 和我一共七人组成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我们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七所大学合作，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负责，成立培训班。我自己来自南方，建议将中山大学包括在内，但教委没有同意。大概因为资源有限，必须集中使用，以免过于分散。从 1985 年起，在人民大学举办培训班，到 1996 年止，长达十一年之久。复旦大学稍后亦成立培训班，由于经费不足，提早结束，从 1988 年到 1993 年，前后有五、六年之久。我们进行中美经济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美方的机构称为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中方由黄达担任主席，名称为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U.S.）。1995 年我们美方的七人委员会已经解散，但中方的委员会仍然维持，继续活动，也请我去参加。和美方委员会合作的是中国教育部（1985 年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 年再恢复为教育部），由教育部决定七个大学和美方合作。其中可能有很多学校想要争取，至于如何决定取舍是中国政府内部的事。

福特基金会的经济学培训计划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行，两个地方都举办为期一年的经济学训练班，但举办的时间长短不同。人民大学的时间比较长，从 1985 年至 1996 年；后来复旦大学也成立一个类似的培训中心，从 1988 年至 1993 年。我的经济学暑期训练班 1984 年先在北京大学举办，经费由我自行筹措；1985 年和 1986 年改在人民大学举办，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所以我在人民大学从事两项教学活动，一是 1985 年和 1986 年的经济学暑期训练班，二是一学年的经济学培训班，由人大经济学训练中心主办。人大和复旦这两个培训班请了许多英、美教授来授课，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影响很大。

从 1985 年秋天开始，我帮人民大学的培训班，每年找四个教授去讲课，通常很难找到肯去一年的教授，只能找到去任教半年的教授。第一年找了 Daniel B. Suits 与 Leonid Hurwicz 等教授去，也有些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去中国教课。Suits 在课程结束后写了一份心得报告，称为 Daniel Suits Report。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有一年的经济学培训，由美国老师去教书，用什么教材，中国学生有什么反应等。我们邀请的学者水平相当高，Daniel B. Suits 算是有名的学者之一。第一年最有名的学者，就是 Leonid Hurwicz。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师资。1986 年

我们邀请了 Michelle J. White 和 Roger Gordon 夫妇，都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者。Michelle J. White 是 Roger Gordon 的妻子，她的专长是法律经济学。Michelle J. White 是 1970 年我第一年在普大教书的时候，在我班上研究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学生。后来他们两人结婚，有一天顺道来普林斯顿访问，我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去中国教书？他们答说有。我就马上安排他们去教书。现在他们两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因为他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收了很多学生，或是从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学生都相当优秀。很多美国学者想要去中国教书，他们知道我们有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计划，就来申请。我们挑选其中最好的学者，每年每学期只能选三个人，水准不一定整齐。在培训班教过书的学者，还有 Robert Mundell，他后来对人民大学的发展很关心。另外，Belton Fleisher 也去教过书，他后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培训了很多中国学生，还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顾问。

我们这个委员会和教委合作举办培训班，工作进行很顺利。此外，我安排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而且培训班成立之后，也有很多学生利用此一机会结识美国各大学的教授，趁便请他们代为安排介绍出国念书。1995 年人民大学聘我为名誉教授，1996 年人大培训班结束。因为 1995 年是最后一年，中美双方委员开会的时候决定要整理全部的学生名单，中方委员会说福特经济学培训班结束之后将编撰成书，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当时的培训班主任是黄卫平，他也是黄达校长的助理。黄卫平后来参与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的中文翻译工作，和我常有电子邮件来往。

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和经济学培训班，由福特基金会支持，它最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中国一般人对于念书受教育的看法，使大家认识到在中国会讲英文又念经济学的人，是有学问而且吃香的人。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培训班都高度发挥了此一功效。参与培训班的七个大学，每年可以派一个研究员出国半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之后遭遇不少困难，有些基础不好，念研究所课程很吃力。但是这些人已是经过我们严格挑选之后才派出国的。其实有人说中国多派一些人出去，认识外界的情形，有助于改革开放。例如专门训练培养干部的中央党校，它的校长、院长等高级领导人在 1980 年代都没有出过国，如果能够安排他们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管理学院去访问，一定会有影响，吸收国外知识与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1986 年世界银行也在中国培训经济学人才，在北京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举办国民经济管理讲学班。我没有参与这个计划。我进行的项目是从 1985 年起与教育委员会合作，培训经济学的师资；世界银行则是训练政府官员。

1987 年由世界银行提供经费，也在上海举办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事后世界银行向教委建议修改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教委接受此一建议，现在中国的大学经济系课程，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金融财政等，一如美国大学的必修课程。过去教授的社会主义课程仍然存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亦开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列入经济思想的范畴。中国人很聪明，有用的课程就很多人念，所以念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从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材开始，教育部要把经济学的课程从马克思主义改成新的经济学，先开会讨论由中国自己编写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我建议改用「现代经济学」一词，教委同仁也赞成，但是仍保留马克思经济学。他们的说法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利用。经济学教材编写也是由世界银行支持的计划，会议中先决定那一门课要列为必修课，然后讨论由谁撰写，内容如何。福特基金会则支持另外一个项目，经济学培训班计划。他们两者努力的方向都相同，目的在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有人认为 1987 年推动中国修改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与教材，对经济学教育的影响很大。1980 年代末期读经济系的本科生，就是使用这套教材（「教育部统编核心教材」），只是尚未出齐。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从教师层面向学生推广普及的里程碑，它的修订版到目前都还广为使用。

此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范围，包括赞助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研究计划等项目。至于研究计划，则由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与社科院合作，包括它所属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所等。有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透过我们的合作计划申请经费资助。不过我想要保持个人高度的研究自由，不愿意为了经费而加入，所以没有和社科院合作。现在美国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研究有兴趣，毕竟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相关论文发表日多，参考《美国经济评论》的内容即可得知。我相信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未来将影响美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发展。

## （四）留学生与现代经济学

### （1）选派留学生出国

虽然我在 1983 年十月才开始参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但是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的构想在此之前早就形成了。根据友人的回忆，早在 1981 年十二月我在家里宴请一些朋友，席间就已提到经济学留学计划。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当时欧美各国颇有差距，以致于经济系的毕业生或研究生很难到国外念经济学，因此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单位建议，每年赞助二十名中国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各大学改念经济学，并提供第一年预备期间所需的经费。因为一年以后他们成为各校正式的研究生，就可以申请奖学金，经费自然不成问题。不过在座有些人对此抱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与西方分属两套不同的经济制度，因此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行不通。我却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至于真正付诸行动，要等到 1984 年的夏天。

1984 年我离开上海之后，和太太 Paula、女儿小梅（Jeanne Mei Mei Chow）一起去杭州西湖旅行。在火车上，我写信给高教司副司长夏自强（他也是北大兼任教授）、王复孙、王泽农，商谈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之事，我愿意帮忙。考试题目包括数学和经济学两大项目，数学有微积分、代数、概率；经济学则用我的《中国经济》英文本，由我出考题。有些留学生日后因此戏称之为「Chow test」，与计量经济学的「邹氏检定」（又译作邹检验，Chow test）同名。

直到我抵达广州，都没有收到教育部朋友对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回信。我想夏自强等人向来办事效率很高，这次迟迟没有回信，可能因为兹事体大，要开会才能决定。我回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后，收到回信说他们接受我的建议。于是在 1984 年底开始考试，很多人读我的《中国经济》教科书。公费留学生只考两个科目，一门经济学、一门数学，所以报考的人，念数学的比较吃香，很多留学生都是数学系毕业。学生必须两科都在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因此，1985 年中国开始送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

按照惯例，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入学申请日期到一月底截止。我负责帮忙安排中国留学生申请学校。对我来说，这件事并不难办。普林斯顿大学有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名单，因为每年经济系约有二十个博士生毕业要找工作，我们推荐他们到各个大学去，在推荐函表格内介绍学生的论文题目、专长学门、指导教授、联络地址和电话等。我利用这份各校系主任的名单，打好一封信，并找 Edwin Mills、Sherwin Rosen、John Taylor 三位教授共同签名，说明我们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学生已通过经济学和三门数学考试，经济学由我们出题，希望他们接受这些学生就读。我替留学生写介绍信给各学校，一个学生可能需要写三封介绍信给三个不同的学校，申请入学。结果收效很大，学生经过安排进入数十个大学就读，而且多半都能得到奖学金。

例如我介绍白聚山去申请史丹福和康乃尔两个大学，康乃尔大学没有收他，史丹福大学则要求他的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 (GRE) 测验成绩，两个学校都有意见。我不记得问题如何解决，不过他最后取得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曾在麻州理工学院教过书，现任纽约大学正教授，住在普林斯顿，写过相当好的文章；还有一位留学生陈晓红女士，同样是纽约大学的正教授，也是计量经济学专家，现在耶鲁大学请她担任正教授。另外有陈松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去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教计量经济学，担任讲座教授。洪永渺是经济学教授，在康乃尔大学教书，现在厦门大学也请他主持一个新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WISE)，担任院长。周林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现在是亚利桑纳州立大学的讲座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派学生出国留学影响很大。大家都想要出国，有些人想要念哈佛大学、麻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即使本来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为了出国的机会，也只好念经济学。正如李政道安排学生出国留学，大家都抢着念物理学。刁锦寰在我之后一两年也安排学生出国念统计学，他有时抱怨有些学生并非想念统计，出国之后就转念别行去了，让经手安排的人有受骗的感觉而不高兴。我就不同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只要他们自己认为好，转系也无所谓。至于其中是否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道德观沦丧的问题，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这种转系的行为违背承诺，原先答应出国念某一学科，达到出国的目的之后，就转到比较热门的科系就读。我的看法是只要他出国时，不是一开始就存心欺骗的话，我可以接受。例如我安排他来美国留学时，他是真心要念经济学，后来他的兴趣改了，我就让他转行。这是一种自由选择，和一开始

出国的時候，就有心欺騙的情形不同。但是如果一開始來美，就已經存心欺騙的話，就是不誠實。不過，刁錦寰的學生情形就很難說。可能學生一開始要來學統計，但是在管理學院看到別人學金融可以賺很多錢，就改變主意。對刁錦寰來說，他本來想為中國訓練一些統計學的人才，結果訓練不出來，自己也付了經費，學生卻轉到別的學門去，當然很不高興。

對於中國留學生學成之後滯美不歸的情形，我的看法也和他人不同。李政道安排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在我之前，由他爭取美國各校的獎學金，中國政府可能只提供機票，沒有其他經費，而美國大學學費一年要兩三萬美金，他出了很大的力。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比較相信自由。我遲至 1984 年才開始替中國安排留學計劃，但以楊小凱為例，早在 1982 年我在武漢見到他，他念過經濟學，具備其他人所沒有的條件，于是我替他安排在 1983 年到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經濟研究所。另一位是于大海，李政道原來安排他去賓州大學物理系，賓州大學的教授們稱贊他是該年最優秀的學生。後來他想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來念經濟，我也替他安排。于大海到普林斯頓之後表現良好，1983 年和 1984 年是最傑出的學生。第三年開始他參與很多活動，因此論文沒写完，沒有拿到學位，就去 Dartmouth College 教書，當講師。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他也很活躍。

1996 年夏初，于大海打電話給我，想要完成論文，取得學位。我告訴他只要能寫出好的論文，其他都不成問題。我詢問他的研究興趣，他想研究金融問題。我的《動態經濟學》（*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一書剛出版，其中有專章討論金融，我先讓他讀了之後，再來和我討論。後來他果然回到普林斯頓寫完論文，拿到學位。他大概六年前畢業，指導他寫論文的教授是 Michael Woodford。Woodford 教授很有名氣，本來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Ben Bernanke 擔任普大經濟系主任的時候，把他挖角到普大來。他的專長是宏觀經濟研究，普林斯頓大學的宏觀經濟陣容很強，他是其中之一。可惜兩年前被哥倫比亞大學挖角過去，現在在哥大任教，我一直認為是普林斯頓的損失。于大海的論文也寫得不錯，畢業之後去了波士頓的 Tufts University。他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教職，其實以他的能力和資格夠條件，只是年紀大了。在美國，我想年齡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聘請一個助理教授，希望他以後可以升等成教授，如果年紀太大，就不值得投資，當年紀越來越大，也就是最有生產力的時間已經減少了。他非常可惜，人很聰明，但去參與政治活動（這一點我不予置評）。後來我還和他有聯繫，不過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有一次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讨论杨小凯和其他同行对经济学有多少贡献，认为学术贡献必须通过市场检验。也就是说国际学术有公认的评价，不是像中国有几位经济学家自我推销。他们城市大学的毕业生如果没有通过市场检验，不但在美国，甚至在香港，也找不到很好的就业机会的话，就可以说贡献有限了。

透过这个经济学的留学计划，中国教育部送公费留学生出国，从1985年到1988年，一共持续三年。后来教育部发现培训学生、举办考试，都需要经费，出国以后由我安排申请学校，出国机票也需要教育部出钱，然而学生一出去就不再回国。一旦知道留学生不会回国，教育部很快就决定终止这个计划，不是我不愿意帮忙。以中国当时的收入而言，一般优秀的年轻人没有能力出国，如果没有这个留学计划，由美、加各大学提供奖学金的话，教育部没有足够的经费送他们出国。以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留学政策就很开放。国外的学校会提供奖学金补助优秀的学生。美国有很多研究生，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今年（2006年）一共有二十五个研究生，都要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没有台湾来的留学生。不过有七位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来自香港，其他六人之中有两位先到美国，再从其他的学校转学过来。他们先在别的学校取得很好的成绩，再找一个更好的学校转学。有三个人来自北京，其中两个人是北大的毕业生，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武汉大学或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我有研究生名单可供参考。学生入学之后，除了免学费，学校还提供每人一年两万多元美金的生活费，所以当学生的待遇很好。现在学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

经我选派国外的留学生大多留在美国，别人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认为中国选派留学生出国好处很多。首先因为有出国机会，大家都来念经济学，所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迅速发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其次，栽培留学生等于为世界训练人才，学成之后担任美国教授，或训练人才，或教书研究，两者都很好。我也是美国公民，美国能有杰出的人才，我也很高兴。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他们也替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帮忙训练人才。例如1996年八月人大校长黄达举办金融政策会议，部分经费来自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可见他们也帮中国做事，只是不住在国内而已。有些留学生学成之后去香港各大学任教，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系1994年有十六位教师，其中有六位由我安排出去留学，近年恐怕已不只此数。

关于留学生是否回大陆服务的问题，李政道和刁锦寰等院士栽培中国留学生，也希望他们将来学成回国服务；就我个人而言，则认为应该

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不会说服他们回去。我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求人做事。合作必须对双方有利才行，对方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做事，这样事情才能成功。不必因为从前替他做过事，后来就要索回报偿。儒家也主张「施恩勿望报」。如果学生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我一定从他的角度出发，替他做长远的考虑，追求他的最大效益。留学生回中国服务，必须要对他们自己有利才行。

尽管我相信自由是个人抉择的重要原则，但是教委从前和我合作送留学生出国，现在他们又想鼓励学成归国。他们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发展，所以想法未必像我这么开通，虽然他们也知道留学生在美，仍然对中国提供短期服务。例如中国对外还不太开放的时候，钱宁就办了一个杂志《科技导报》（*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希望引进国外的科技，要求我帮忙。我就邀请比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替他们写文章，例如Kenneth J. Arrow、Simon Kuznets、Theodore Schultz等人。他们投稿的文件先寄给我。有些文章还不错，他们用英文写，我们再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台湾也是如此，李国鼎认为台湾为栽培留美学生所付出的代价，由于他们后来多留在美国工作，已足以偿付美援绰绰有余，因此主张制定办法鼓励留学生回国，争取人才归国服务。就李国鼎的立场而言，他想促进台湾经济发展，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这是台湾政府官员应该做的事，中国也是如此。我没有留意这些做法成效如何，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形很分散，各地的做法应有不同，像现在一旦经济条件及其他环境改善，回国的人自然会增加，和台湾近年的情形一样。

台湾早年也有很多留学生不回国，他们担心回国以后再也无法出去，或是回去之后国内的研究环境不好。这样一来，政府就要求他们赔钱，因为他们不回国履行应尽的义务。中国也有类似的办法，可能在出国之前，教育部以国家培养大学生花了很多钱为理由，要求学生先付一笔保证金再出国。将来回国以后，政府就退还这笔钱。现在中国有钱的人很多，付出一笔保证金不成问题。

现在中国的留学政策已经完全开放，办理出国留学并不困难。至于由政府出资送人出国留学，以 2006 年为例，中国决定每年提供五千个留学生名额，如果他们能得到外国学校提供学费，政府将给予旅费和生活费。过去我曾安排许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由教育部考取之后，我写介绍信，推荐他们申请入学。

早年我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也曾安排学者进修。例如现任台湾银行总经理的李胜彦，他本来在经建会从事计量模型研究，1978 年前后我

介绍他去美国留学。我写信给一位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最适控制，这是我的专长研究领域。后来李胜彦就在匹兹堡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再回台湾服务。2006年七月我来台北，他来邀约会面，我们在中研院活动中心一聚。李胜彦夫妇一起来看我们，我们非常高兴。

## (2) 经济学教育的现况

最近我在岭南学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报告，说明现在中国各大学争相引进经济学方面的人才，他们的待遇不但比台湾好得多，也比香港还要好。香港的待遇曾经有一个时期和美国一样好。现在中国有几所大学（例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部分经济学教授待遇特别高，有「四五六」的说法，就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的年薪，分别是四万、五万、六万美元。大部分的学校大约以年薪二十万元人民币聘任助教授，其他的职位年薪待遇相当灵活，外人不一定知道。由于中国物价低廉，这样的收入在中国的购买力很高，另外还提供住房宿舍。通常的做法都是找一个在美国或国外比较有成就的学者挂名做院长，这个办法就和当年台湾邀请蒋硕杰兼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一样，他同时在康乃尔大学担任教授，一年回台两次，大约三个月。中国也是以这种方式吸引国外人才回来。例如上海财经大学，政府拨了好几千万元给它，经费相当充裕，因此它在两年之内聘请二十几个留学欧美的博士回去任教，很不容易。

邀请这些国外著名的教授回来，兼任中国国内的院长，一个最好的理由是他至少知道学术行情，在这个学术圈里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例如每年一月美国经济学会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去参加，代表学校面试这些刚毕业的年轻博士。他们征才的时候，多希望对方能够用中文教经济学最好，也可以用英文教学，因为大陆学生的英文水平相当高。如果外国学者愿意应聘，也很受欢迎，曾有一些外国人去中国任教。我向岭南学院报告征求师资人才和提高待遇之间的关系，以清华大学的高薪挖角成功为例，说明岭南学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所以竞争不过清华、北大，无法争取更好的人才，希望校方能够提高待遇，最后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而告失败。清华大学争取到两位教授，一位是白重恩，他本来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一年多以前被清华大学挖角，去担任经济系主任；另外一位是李稻葵，他也在我开列的候选人名单里，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被清华大学挖角。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居中国的学术领导地位，北大

成立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林毅夫主持；清华也成立一个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由李稻葵主持。李稻葵和白重恩都是清华大学从香港挖角去的。只要是好的人才，中国可以从香港挖角回去，不一定非要去美国挖角，甚至就连香港也在挖角。中国有利的条件是薪水待遇高，美国有利的条件是环境不同。有些人在美国住了一段长时期之后，不习惯中国人做事的方式，中国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美国不同，回去之后有些事情无法接受，尤其是官僚作风，不容易适应。

中国从国外争取人才回国，有时要兼任行政工作，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形。例如清华大学是中国挖角最成功的例子，它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挖角的教授姚期智（Andrew Yao），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普大的计算机科学系任教，很有名。他在 2004 年被清华大学挖角，因为杨振宁仿照普林斯顿大学，在清华大学成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吸引国外杰出的研究学者回去。它还附带礼遇条款，就是只做研究而已。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姚期智是杨振宁争取国外人才最成功的例子，方闻则是另外一个例子。方闻和我同年，现在还拼命发表文章，也被清华大学延揽回去。他们两人的待遇是一年一百万元人民币。姚期智回去，还附带汽车、司机、助理、宿舍。杨振宁和姚期智的宿舍都一样，房子很漂亮，最少有六、七个睡房，还有一个花园，占地很大、很美，当然有人照顾管理。姚期智长期住在中国，方闻虽然答应担任教授，但不常在国内。他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有一个办公室和姚期智比邻，但从来不用，还是长期住在普林斯顿。方闻帮清华大学很多忙，包括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在中国做短期的训练，或在美国接受训练。方闻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替清华大学建一个博物馆；第二是帮清华办一个展览，他最擅长办展览，1996 年曾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到纽约展览，造成轰动；第三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艺术史研究所。现在这个研究所已经成立了，虽然在名义上有一个副所长替他负责管理，但是方闻称他为所长，认为自己只是挂名而已。在所内有副所长代他管事，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一方面用电子邮件联络，指导训练他们；另一方面想安排他们去美国接受短期培训，就这样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

经济学者回到中国，可以成就很多的事业，可是在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上，可能会落后。选择回中国或留在美国，对经济学者而言，可能导致选择两种不同的事业发展方向。一般来说，我认为如果真有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愿意回到中国，继续做研究，一定会大受欢迎。目前看起来并不乐观，例如清华大学就有好几个特别礼遇的教授名额虚悬，就连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的待遇也请不到人。只要是在美国比较杰出的人才，清华都想争取，但是没有成功。中国现在的折衷办法就是用挂名的方式，当事人并没有真正回去。目前在美国有些金融财务方面的学者表



现不错，例如 2004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经济院士的罗闻全（Andrew W. Lo），比较年轻，也相当有名，任教于麻州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金融财务系。如果像他这种人肯回去清华大学，可以拿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纯粹只做研究。不过可能因为中国的研究环境没有国外好，学者难免顾虑一旦到了新的环境，能不能再写出论文来，这点很不容易克服。以我自己在普林斯顿的例子就很清楚，因为自己的同事都是一流的，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和他们谈一谈，如果在中国要找谁谈呢？当地没有一群第一流的同事。不过，姚期智不同，他可以自己解决，在他的专业领域中国有很多著名的理工人才。他偏好多训练一些比较年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预备形成一个研究小组，希望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也可以做到，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像姚期智这种愿意回去的人。

根据一位年轻学者的现身说法，留美学成返国任教的人现在多面临永续性（sustainability）的考验，他们的前途充满不确定性。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式的政治滥用在美式的学术制度上。学术的泛政治化，使年轻人的升等考评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朝令夕改，以致于年轻资浅的学者无所适从。二是专业研究可能落后。这对年轻的学者影响特别大。因此，中国国内虽然用高薪吸引学者回国，对于未成名的年轻学者大多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因为永远不缺想回国的年轻人」。可见经济学的就业市场有了国际竞争，也是一件好事。

谈到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缺乏素质良好的师资，最重要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中国地广人众，需要很多师资，这个目标不容易达到。现在我们已经训练出一批人才，这一批人回国之后，即可在国内继续培育人才。从前我主持 Chow test 甄试出国留学的这批人，现在已不需要我推动，他们自己会继续进修。他们毕业以后，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或回中国服务，都任凭自己决定。有时候他们很客气，会对我说一声。例如 2006 年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院长的周林，他接受这个教职的时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他说现在已经学成为国服务，至少有了交代。他能想到要告诉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不说一声，我也不会介意。

现在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士都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譬如我的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在美国念完书以后，能回国替他多赚一些钱，原则上我也不反对。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我就没有回大陆。我的哥哥学建筑，他回国以后也帮父亲做营造建筑生意。我自己后来去教书做研究，比较少见，不是一般人的典型。传统上将商人视为四民之末，是社会最低阶层的观念，即使在我父亲的时代已不适用。我的父亲在广州担任商会会长，他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传统的四民观念已经不存在。根据余英时的

研究，传统中国会将家族中最聪明优秀的孩子送去读书、考试、做官。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是过去的历史，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

这批通过教委留学考试的人，他们回到中国之后，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也有机会去大学教书。如果有机会担任企业顾问，他们也会去做，甚至放弃学术，完全成为商人的情形也有，连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也有人这样做。我认为在中国人的观感里，赚钱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好事。以美国为例，有些麻州理工学院的知名教授，自己研究金融，后来就到纽约的华尔街投资赚钱去了。在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就会去赚钱。

在香港尤其如此，虽然香港的情形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香港完全是商业性的文化，财富越多的人，社会地位越高。金钱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对其他方面一点也不关心。中国大陆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就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而言，对于金钱看得很重，从近年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即可得知。这是因为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之后，现在有了一些财富，人们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不过现在中国的价值观已经多元化，人们可以选择做教授、任官、经营企业，都有成功的机会。我第一次提到中国的「多元化」，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形很普遍。

在香港有一个中国银行，另外还成立一个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主管外汇和中国对外投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则是一个投资银行，主管利用中国的资金去外国投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李山（2001-2005），也是由教委留考项目送出国。他能够担任这个职位，可能因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当这个职位出缺的时候，有很多人注意，我有时候也看中国的报纸，有一些相关的报导。他们开始审查候选人的时候，正好朱镕基担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即使担任总理的期间，也没有辞职，还一直兼任院长。他一方面做总理，一方面做院长，至于院长是不是他在做事，是另一回事。不过他对清华的学生相当关心。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山（这些公费留学生我都没有见过），有一次我去香港，他宴请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写过不少书，在麻州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美国一个相当有名的金融管理公司做事，后来中国请他回去任职。所以公费留考项目培养的人才，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只是学校的学者而已。

有些在美国相当有名的学者，一部分时间在美国教书，另一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事。例如周林，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一个经济学院，从经济系扩编分立出来，由周林负责；另一方面

他也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担任教职。2006年六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见过他，七月四日我在台北，他也来参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周林本来在美国任教，毕业以后去耶鲁大学教书，也在杜克大学教过书。后来香港城市大学提供他一个教授职位，待遇相当好，所以他回到香港教书。教了几年书以后，香港还是留不住他，他又回美国任教，同时也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梅建平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大学任教，常回国在清华等大学担任教授。另外，李龙飞也是香港科技大学从美国聘请回来，教了六年书以后（1994-2000），又给美国的大学争请回去。

### （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CES）刚成立时，称为中国青年经济学会（Chinese Young Economist Society, CYES）。这是1984、85年之时，由还是研究生的杨小凯、于大海和一些朋友在普林斯顿创办的学会。1983年我安排他们来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两人说要办这个学会，我说：「不要用“young”这个字，因为过不久，你们就不再是young了。」大约过了八年、十年之后，学会才把“young”字删去。第一次开会是1985年在纽约总领事馆，全美国从大陆去的经济学留学生一起开会，大约有四十至五十人，我也参加和他们一起开会。在美国纽泽西州，任何结社或立会要合法登记，于大海没有找律师，他自己上图书馆，研究法律条文，并完成登记，我很佩服他。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一千人，其中很多会员现在已是正教授。这个学会每年在美国开一次会，也在中国开一次会，等于一年两次分别在两个地方开会。在中国开会的地点每年不同，譬如2004年在杭州，2005年在重庆，2006年在上海，2007年在长沙。在杭州举办的会议主题是中国农业，发表多篇论文，会后他们选出比较好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出版。我认为这可能是关于中国农业研究最全面的一本书，因为作者都是专家。陈锡文也在书里有一篇文章，原来以中文发表，再翻译成英文。2006年六月，因为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他也来参加。

当年参与中国青年经济学会的人，现在都已经很有成就。例如张欣是人民大学1985年第一届经济学培训班的助教，现在担任美国University

of Toledo的正教授；陈平也在美国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担任正教授；樊纲是中国相当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钱颖一毕业于哈佛大学，但他不是公费留学生；李稻葵也是哈佛大学博士，他透过我的公费留学项目出国，原来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2005年开始兼任北京清华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先可以在香港处理所务，后来辞去科技大学的教职，从2006年下半年起改到清华大学专任；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助理，着有一本关于中国银行业的书，他也在我为岭南学院开列的争取人才名单上；周林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朱民是中国银行的副行长。

利用 Google 搜寻引擎在网路上很容易找到这些人的资料，他们现在已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学会是全国性的团体，不像岭南学院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他们曾经一起在美国留学，有不少人后来回到中国大陆发展，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团体，这次在上海一起开会的人都是老朋友。他们自己也会安排各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或进修机会，例如这次在上海举办研讨会。会议的论文按主题排列，包括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经济成长和土地发展、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全球化与劳工关系、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创新，很多内容连我都没有看过。我曾提过最后一个主题，经济学原是外国发明的理论，中国先采用这个外来的研究方法，慢慢的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研究出自己的经济理论。

比较历年与会人员的名单，可以知道他们的职位升迁异动情形。其中田国强在上海财经大学任职，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合办。很多重要的人物也从北京来参加，例如杜鹰是国务院的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由从前的计划委员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合并而成）副主任，其他与会者还有上海市长韩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国家统计局局长丘晓华，还有接替戴相龙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等。从这些与会者名单可以看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力。开会当天我们一起同桌聚餐，其中有些人也在座，我认识他们有不少方便之处，因为去中国做研究的时候，若需要资料，就去他们的单位机构参考。台湾早期发展经济的做法是结合产官学，也就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三方面的合作。不过上海会议没有太多企业界的人士参加。

现在我自己也开始赞助一些访问访问学者短期回国任教，这种做法比较方便灵活。我在中国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而已。

我的老师 Milton Friedman 教了我许多事情，有一次有人对他的贡献有如下的评论。在此之前，我要先交待引起此一评论的背景原因。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有一位罗伯森（Robertson）先生在 1960 年代捐了六千多万美元给它，现在捐赠的基金已经增值为八亿多美元。1988 年威尔逊学院还因此将一栋以精美著称的建筑命名为 Robertson Hall。该学院的财源很宽裕。例如它开了一门大学生选修的课，有一次为了研究中国如何利用能源的问题，全班学生和老师一起去中国访问两个礼拜，学校支付所有的费用，包括飞机票、旅馆等。所以就连学生上课也可以去中国访问，由此可见经费的充足。如果学生要写论文，要求去中国做调查，学校就提供飞机票，因为经费实在太多了。我们经济系常常和威尔逊学院合聘一些教授，实际上由他们出钱聘请，所以连经济系也搭便车，沾了光。一些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威尔逊学院聘任的，他们教该学院的学生，也教我们的学生。最近罗伯森先生过世了，他有两三个儿子提出意见，认为罗伯森家族捐款给威尔逊学院，目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要对美国公共与国际事务有贡献，捐款却被挪用到经济研究和其他的用途，到现在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后来我们有一个教授说，要对美国有贡献，不一定要去华盛顿担任政府官员，对美国经济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是 Milton Friedman。他根本没有长期担任政府工作，但是对国家的影响却很大。他对货币政策有意见，就写成书发表出来。另外，他也提出很多教育政策的意见，影响很大。

所以说影响人们的思想可能比做官更重要，我的老师 Milton Friedman 有这样的看法，我也认为如此。当然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流传一个说法：「中国表面上是政治决定一切，实际上是从政者听了知识份子的一句话。」例如马克思就很有影响力，他没有中国观，即使是错误的影响，对全世界也影响很大。我认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无论做官与否，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或政治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自己的心得是，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找政府官员谈才能解决，有时候写一本书、参加开会、做一场演讲，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由中国经济学者组成的学会，也很欢迎我参加，每一次开会都邀请我去演讲。我参加了历年在重庆、上海、长沙举行的会议。开会之时，政府官员也来听讲。他们欢迎台湾的学者参加，例如钟经樊、林正甫等人参加上海的会议，也有一些欧美学者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还讨论该学会的活动，包括举办一个短期的教学课程；也举办优秀论文的征选，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名义办了一个刊物《中

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现在在学术界的排名地位越来越高。

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也有影响力，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国经济很有兴趣。我可以说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会赶上美国。就总生产来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8年中国的总生产等于美国的一半，但即使从一半开始，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以6%、6.5%来估计（其实中国真正的成长率都高达9%以上），美国每年成长3%，这样推算起来，到2020年中国就已经赶上美国。这是就总生产而言，至于中国的人均（每人平均）所得当然还不能和美国相比，但是很多事不是人均所得的问题，总量也很重要。例如最好的人才可以影响彼此的竞赛，就像两个学校比赛篮球，不是用人均来比较学生篮球技术的优劣，而是每个学校挑选十多个人来比赛，只要代表该校的十多个人球技高超就赢了。

我认为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例如现在美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是世界第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助研究员的升等，要看论文发表成果，这些论文都是在国外投稿，由美国人控制决定期刊的排名高低。这些期刊的排名次序有其道理，因为它确实在研究上领先。现在关于亚洲的经济研究也有期刊出版，这些期刊慢慢地也会形成学术市场。虽然这些期刊部分也在美国出版，但是读者不同。因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成一派，有一些自己专有的问题要研究，例如《太平洋经济评论》。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也是其中之一。我鼓励他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以后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学者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有我们自己的学术市场，不要完全由美国人来决定论文的好坏。对美国来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会。因为在美国有美国经济学会，还有金融财务、会计等其他的各种学会。再就会员人数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学会，不过人数越来越多，以后也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力量。这是就未来的学术发展而言，不过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论文的水平还不够好。

我们可以比对两份名单。一份是1986年留美学生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会的名单，另一份是200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济学会的出席名单。前后相隔二十年，2006年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很多已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我同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经济学留学生可能改变未来的经济研究，至于具体的转变方向，我还没有定论。我自己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从前提过的四个研究方向，但是别人可能有研究。一般来说，当年

的那批留学生表现都很不错。

现在中国已有一群经济学家，彼此可以建立紧密的联系，可能有别人愿意担任他们的领导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种事，既没有兴趣，也可能没有能力。所谓没有能力，是指要运用这层关系也不容易。我几十年前曾帮过他们一些忙，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要求他们跟随我，让 Chow test 的留学生自由发展最好。他们选择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一定是经过衡量以后，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即使是最简单的问题：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去中国？我都不参与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认为留在美国对自己好，就应该留在美国，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回中国去。我不参与意见，因为我对某个人的了解，绝对没有他自己多。我向来尊重个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并认为唯有双方互利的事才能成功。我现在仍本着此一互利的原则，和这些经济学者或政府官员共同合作，继续推动促进中国发展的计划。

一是联合邹至庄项目的留学生，推动中国现代化。2007 年七月十二日我和通过「邹至庄项目」出国留学，而且现在任教于香港的七位朋友，在香港城市大学晚宴。其中包括香港大学的宋敏、陶志刚、张俊喜，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陈松年、丘东晓、王苏生、张处。大家讨论如何把参加过这个项目的人士联合起来，替中国做点事。我们三个初步计划：（1）我们将出版一套论文集。选出各人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每篇加以附注，说明研究心得或个人经验，按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组，做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示范。（2）集合一群会员（即组织或联系参加项目的人士），透过适当机会参与某个中国大学的经济、金融或管理学院，共同任教，包括非全职在内，以建立一所国内最好的经济学院。（3）他们建议本书出版的时候，大家共同开会庆祝，并举办相关活动，希望影响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总之，我们秉持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希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二是我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海外中国青年论坛（The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 OYCF）合作，由我捐款成立基金，选派国外师资（他们多半也是会员）到中国任教。这两个单位组织也同样致力于中国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科学教育，其中有许多成员来自教委主办的经济学留学生及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三是我推动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共

同合作，进行一个中国与全球能源和环境的研究计划，由双方对此一课题有兴趣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参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型计划。2007年六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四是我协助人民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推展学术活动。该院刚于2007年三月正式成立，我将透过人民大学的梁晶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熊伟教授，促成双方更进一步的合作。至于我个人的活动，则包括透过和中国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沟通，致力于消除农村贫穷和改革医疗制度；参与各种学术演讲，如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7年七月在长沙举行的年会、八月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首届国际会议；为中文期刊写文章，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管理评论》、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博览》、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等。

#### （五）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52年私立岭南大学并入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中国的三十五所重点大学之一。早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现在的台湾一样深受美国影响，但后来则采苏联模式成立分科大学，如华南农业大学、工业大学等。不过现在这种做法慢慢矫正过来。1984年我向教育部长何东昌提过岭南复校之事。1980年代我去广州好几次，1985年中山大学授予我名誉教授职位。我和中山大学本科校长李岳生谈岭南大学复校之事，他说对岭南没有什么认识，不了解这件事。1986年中山大学再颁赠我名誉博士学位，这是教委批准的，并非校方所能决定。我是中国第十一个名誉博士。中山大学曾颁赠两个名誉博士，分别给我和霍英东。霍英东捐助不少钱给中国，在我之后数个星期，他也获颁名誉博士学位。

中山大学特别举行一个名誉博士学位颁赠典礼，这与美国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的做法不同。香港岭南校友会会长伍沾德和数位校友赴广州观礼。礼成之后，我和李岳生、伍沾德同一桌酒席。我向李岳生说在中山大学之下成立岭南学院，对中山大学有好处。我的这一番话他听进去，想了几秒钟，然后点一点头，同意此举对中山大学有利。后来便由李岳生和伍沾德继续进行这件事。接着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幼峰也参加讨论。张幼峰、李岳生、伍沾德和我四个人开过数次的讨论会，讨论出来的草案必须经教委批准。伍沾德在北京有一些管道，可能也去活



动。我自己则写信给赵紫阳要求批准岭南复校，至于成效如何就不清楚了。后来李鹏兼任教委主任，批准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88年是岭南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李岳生校长在庆祝典礼上宣布教委已经批准成立岭南学院。1988年秋天董事会成立，每年开会两次。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学董事会，其中有不少外来的香港人担任董事。由王屏山担任院长，我担任名誉院长。我每年至少回广州两次，因为岭南学院的董事会在一月、六月召开。此外，我也是科技大学或香港城市大学的兼任教授。因此，我每次回香港可说一举数得，顺便为母校做些事。中山大学的领导以及国内和香港双方的董事都要我担任名誉院长。

岭南董事会捐助很多钱，帮学校建不少校舍，都很漂亮。其中尤以「岭南堂」为最，即使在普林斯顿大学也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建筑，William Branson教授即在此上课。在中国大陆，由于管理费用很高，岭南堂平日关闭，有活动之时才开放。

广州岭南学院董事会的合作很难得。香港的岭南校友多是企业界人士，很多人捐过上百万港币给广州岭南学院。董事会有三分之二的董事是外来的人，三分之一是中山大学的人，开会之时，双方的观点未必一致。首任院长是王屏山，他原来念电机，也是我的学长，比我高几届。他曾经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在校友之中地位最高。1994年他退休的时候，必须找新的院长来接任。校董们希望从外面找人来接任，好不容易找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元教授出任院长。伍沾德和汪道涵熟识，请他当名誉董事，再由伍沾德邀宴汪道涵和舒元，商议请舒元担任院长之事。中国的人才流动不易，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现在情况已经改善很多。

广东人不一定习惯和外省人相处，而外省人去广东也确实有些不方便。舒元教授原来在上海，上海人与广东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广东人聚在一起都说广东话，而且速度很快。我的太太Paula也生长于上海，她虽然学会广东话，也承认别人说话很快时，只能听懂百分之五十。从前国民政府想要统一全国语言，但没有成功，广东人还是讲广东话。后来人民政府终于做到，广东省境内各大、中、小学一律讲普通话。在中山大学开会一定讲普通话。岭南学院董事会在大陆开会，从前刚开始时都讲普通话，后来香港校董觉得不方便，就讲广东话。现在毕业典礼校董致词，也有人用广东话。这是香港人对广东的影响。在瑞士

有三种通行的合法语言，即法、德、义语，在政府或议会开会时，各自发言。这个办法也不错。

在美国纽约有一个岭南基金会，长期资助在岭南大学教书的美国教师。例如 1947 年教我化学的老师 Dr. Frank，便是由基金会提供薪资。他的儿子已经退休，在纽约的岭南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出席开会。1995 年舒元院长到美国、加拿大各地访问两三个星期，也去纽约向基金会董事演讲。1995 年我从岭南基金会申请到一笔钱，每年可以请人去教两个星期的课，向系上同事征求有意任教者，当时就有五个人表示愿意去。例如顾应昌去教一门国际贸易的课，他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教授名单可以查阅美国经济学会的报告。1996 年 William Branson 也去过，他原来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后来转而研究经济发展，去开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此外，有一位校友林思齐，曾在温哥华担任副省长（Lieutenant Governor），也捐一笔钱给岭南学院教师做为研究费。我觉得未来广州岭南学院很有希望。

香港岭南学院与广州岭南学院没有正式关系，不相统属，实际上两者仍有合作。1938 年我在香港念岭南小学，日本占领广州之后，岭南中学也迁到香港。1945 年以后岭南大学迁回广州，在香港设中、小学分校。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一九六〇年代校友想重建岭南大学，于是在香港设岭南学院。香港的私立岭南学院开销大，很难维持。利荣康（J. K. Lee）是香港岭南学院董事会（称岭南机构）主席，他在 1980 年代补贴所有不足的经费（利荣康是岭南中学兼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现在香港的岭南学院是香港的大学之一，广州的岭南学院则已成为中山大学的一部分，但两者均有校友会在活动。1986 年初利荣康邀请我去香港，由两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两个香港人共同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我当主席，花了一个星期访问香港岭南学院，提出各种建议改良方案，办学情况改善。1987 年以后香港高教委员会逐渐将岭南学院编入官方教育体系之内，由政府补助，从此经费充裕。1988 年是广州岭南大学建校的一百周年纪念，经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岭南（大学）学院。香港的岭南学院和广州的岭南学院虽然是独立的两个机构，香港有几位校友身兼两校的董事，出力很多。我是广州岭南学院的名誉院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香港岭南学院的院长也来参加。

1996 年七月一日我们几位经济院士去拜访李登辉总统。其间谈到教育问题，我们赞成 Milton Friedman 的办法，鼓励私人兴学，无论大、中、小学都可以开放。政府鼓励教育，不等于政府要自办学校，可以用补助学费、由学生或家长自选学校等办法来增加各校竞争，以改善办学

的品质。中国现在办教育很灵活，岭南学院董事伍舜德在广东台山办了好几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专门学校都有。他还捐助五邑大学，这所学校不是教委直辖的重点大学，但办得很好。另一位董事黄炳礼也捐了很多钱在台山办教育。华侨对于中国的教育贡献很大。

岭南学院成立的时候是 1988 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那时候中国还相当穷。香港的岭南校友捐款要用自己的名义，一共捐了十多栋大楼，但是他们不太愿意捐钱做学术研究，例如设立讲座教授。岭南学院董事会一年开两次会，我在 1998 年就以名誉院长的身份向董事会提出报告，说明有一批留美的经济学家在学术方面比较有成就，都是很好的讲座教授人选，并列出他们的名单。可惜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此，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校友没有捐太多钱。直到 2007 年初董事会才通过募捐五个讲座教授，每个捐助两百万元港币，以十年为期，学校和学院也给予相对的资助，以后可以更加强学院的师资阵容。

岭南学院不是完全独立，而是比中山大学开放一些。现在岭南学院的情形已有不同，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一方面现在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集中分给三、五个学校，例如清华、北大，还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也得到一些经费，可能其他的学校也有，但是不如他们那么多。岭南校友的捐款和这些学校分到的经费无法相比，他们的经费比岭南学院更多。另一方面岭南学院开办企业管理硕士班（MBA），赚了不少钱。岭南现在最有名的是培训企业管理硕士人才。中山大学本来设有一个管理学院，岭南学院也举办企业管理硕士班，因为岭南也算是中山大学的一部分，等于是中山大学内部互相竞争。管理学院的人认为岭南既然办了企业管理硕士班，自己也来办一个培训班，而且要比岭南办得更好。所以中山大学就给管理学院很多经费，盖一栋大楼，大概三、四年前已盖好，比岭南学院的大楼更大。现在岭南学院拥有校友基金的优势已经所剩无几。我是中山大学的第一个名誉博士，中国的第十一个名誉博士，也是中山大学的校友。

关于现在岭南学院的情形，我有两点可以报告：一是培训企业管理硕士的项目，二是举办研讨会。岭南学院和麻州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合作，举办企业管理硕士班，非常成功。这个合作项目要追溯到六、七年前，史隆学院的副院长 Alan F. White 预备和清华、复旦两个学校合作，帮他们建立一个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班（international MBA）。训练的教材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利用麻州理工学院自己编的教材。史隆学院的人来中国的时候，途经香港，岭南有一位校董郭志权（Philip Kwok），也是麻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就宴请这些人以示欢迎。（当时我

不在岭南，而在美国。)郭志权表示岭南也有意加入合作计划。麻州理工学院的人就以岭南学院并不在原先的合作计划之内为理由，要求支付五百万元美金，就可以合作，替岭南培训师资。每一年岭南学院可以派几位教师赴美，一个人来一个学期，选一门课，吸收麻州理工学院的教材，临走之前再写一个报告，说明这门课如何在中国应用，等于培训一个教师。这个人选当然英文要好才行。麻州理工学院的人说他们提供教材，也提供图书，所以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麻州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证书，表明其参加的是史隆管理学院和岭南学院合作的企业管管理硕士班。在中国的岭南学院培训，念了两年书以后，可以取得麻州理工学院的证书，比起国内其他的企业管管理硕士班更吸引人，所以这个项目办得很成功。现在中国有一个统计，比较进修各大学企业管管理硕士的附加价值，根据学生在入学之前和毕业三年之后收入差额的高低，来看教育投资的报酬。根据富比士杂志最近的调查统计，岭南学院和麻州理工学院合作的国际企业管管理硕士的项目，在全国排名第三。

另外，岭南还举办一个项目，就是现在中国很流行的高阶企业管管理硕士班(EMBA)，采为期两年，每个月集中四天上课的方式。岭南也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一个EMBA培训班。早期纽约州立大学对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做了不少工作，在大连设有一个培训班，派了很多人来参加。后来岭南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合作，一半的师资由岭南提供，一半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师资，每位教师到中国来十天，连上两个周末的课。三年前举办第一届企业管管理硕士班，可以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的硕士学历证明，这是有史以来中美合办的高阶企业管管理硕士班第一次颁发美国文凭的项目。他们上课用英文，中国大部分这种硕士班还是用中文上课，岭南学院的国际MBA项目则用英文讲课。先是明尼苏达大学来中国，到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合作单位，选中岭南。因为岭南的环境很好，校友捐建十多栋大楼，建筑很漂亮，而且够水平。他们看中岭南的好处，愿意和我们合作。每个学生的学费是三万多元美金，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各分一半，不过岭南学院还要给中山大学抽取一定的百分比(不同的项目，学校抽取的百分比不同，明尼苏达大学项目大约是8%)。这样一来，学校可以开办各种培训班营利，岭南办了两个企业管管理硕士的项目，获利颇丰，学校的经费来源很充裕。另外，有一部分企业管管理硕士的课程是经济学，如果经济系的教授愿意去教课，还有额外的收入。

清华大学也举办了好几个企业管管理研究所，其中有一个是专门为南方的深圳、广州、东莞几个地方的经理们开办，因为清华大学的名气大，很有号召力。清华企业管管理硕士班的学费是四万多元美金，岭南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的企业管管理硕士班收费较低，大约三万多元美

金。因为清华收费较高，获利更大，设有好几个分部，在北京、深圳都有开办。人们想要取得清华大学硕士的名义，于是清华就到南方来办分部。传统中国的文凭主义还是存在，清华大学的名号比较响亮，就最后到手的文凭而言，清华大学比较值钱。不过各个企业管理硕士班之间有评比。资料显示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企业管理硕士班在有些项目的评比是全国第一。其中一个理由是用英文上课，水平比较高。清华硕士班的学员，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大学教育，很多企业人士做生意有经验，开工厂、办企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也想开一开眼界。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深圳，在附近上课，每一个周末去听课，对他们很方便。2006年六月学校安排他们来美国哈佛大学十天，参观美国的公司，看一看美国的情形。另外，在毕业之前他们还要去北京，在清华大学上课一个礼拜。他们在美国时，也来普林斯顿大学，由我替他们上课，用中文讲课。这些学员给我名片，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总经理。我准备了一些用电脑软件 Power Point 做成的简报，内容是英文，但我用中文解说，因为大部分的人连英文都看不懂，播放英文简报毫无意义。我以为他们的英文不一定能流利的对话，至少可以阅读，事实上有些人根本看不懂英文。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的培训班水准可能高一些。

来进修企业管理硕士的学员，有些来自私人企业，有些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人员，当然由他的单位支付学费。到普林斯顿大学我那儿去的学员，大部分还是民间企业人士。至于中国政府送官员到国内外进修，也有一些这种课程。例如哈佛大学的甘乃迪学院（Kennedy School）和中国有一些合作项目，设有短期的讲学班，欢迎中国官员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学院也有一些课程，训练外国人士。普林斯顿大学不只限于中国，他们最近也邀请日本大藏省的次长来教一门有关日本财政的课。

另外，政府官员在国内的培训也很有意思。例如最近的农村改革，他们成立不少干部人才培训班，也称为干部学院。中国的干部学院设在浦东、延安、井冈山，可以找些国外的人来替他们上课训练。2006年六月三十日我在上海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因为经费不足，他们在当地和上海财经学院合办。我们开会时住在浦东干部学院，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的培训学校。我们进去住宿的时候，检查很严格，因为里面有很多政府官员。我第一次去浦东干部学院，设备都还不错，我住的是部长级的房间。我去之前，先在交通大学演讲，由交通大学派车送我去，要事先联络打电话，安排一个人来接我，否则一般车辆不能进出。这种情形和我去拜访安志文相同。安志文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研究会是政府机构，门禁森严，必须有人事先安排联络。在美

国外交部，一般人随时可以去，但进入室内以后，不能直接上去，必须先经过里面一个接待处的安排。台湾的情形是到了外交部，除非有人引介安排，否则进不去。这种官场作风观念在中、美国情各有不同。

早期送政府官员到国外受训，主要的目的是让中国官员开拓眼界、提高行政效率等，不属于经济学的专业训练，也可能有部分经费来自美国的民间公司提供。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国内经济学师资培训班的费用，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赞助。中国政府对于接受美国民间公司的经费培训他们的官员，没有所谓和平演变的疑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向国外学习。现在中国的官员大部分都到国外去过，他们从 1980 年起就希望做短期的访问学者，例如去某大学访问半年，学一些东西，回去以后很吃香，升迁很快。当然，这需要英文能力，除非去欧洲访问。中国很大，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即使没有出国进修，总是有机会去国外访问。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可以制作电视广告，替美国药厂在中国促销产品。他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弄得更好一些，就安排山东省人事处一百多人来美国访问，名义是和美国交流。他们是人事单位，不是外贸单位，人事就是管人的，有什么理由去外国呢？其实他们只是借名义到外国去，一方面旅游，另一方面学点东西，利用政府单位的经费向外跑。有一个普大校友，为了帮助一个在中国比较贫穷地方的学校，安排他们的校长、副校长、书记都来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要求我帮忙他们的学校。后来有一个中国朋友说：「你捐给他们的钱，都让他们旅游花掉了。因为捐款已经变成学校的经费，就随便他们用了。」那也是一个公立学校。政府机构的人到处跑，也是好的，开一开眼界。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变相的贪污腐败。不过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贪污腐败。例如我们教授有研究费，我也可以用来旅游，借口自己去开会，要求校方帮我买机票，当然我可能真的去开会。这很难划清界线。

政府官员出国也和外面进行交流，不是完全不做事。基本上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再像过去文革之时忌讳和国外的往来关系，而是鼓励发展国外交流关系，他们现在的态度是向外开放，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过，中国的干部学院各有不同的特色，上海浦东的设备很好，很现代化。可能延安和井冈山两个干部学院就不一样，因为训练的方式和目的各有不同。

第二，我鼓励岭南学院举办研讨会。我花了不少时间，每一次去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先要求每一个人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他自己的论文，要

求其他的同仁一起研读。这些年轻的教员所写的论文，我都看过，每一篇都有评论，这样办了好几回。过去岭南缺乏经费，有钱的校友指定捐款用于兴建大楼，而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因此无法设立讲座教授，也不能聘请国外的教授。我每年都要回香港两次，自认为可以帮助岭南学院，训练他们的师资。在我去香港之前，他们将现在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先寄给我，我事先做好书面评论，等我到了学校之后，再进行研讨会。等于是我用个人的力量提供他们一些帮助，无法扩及全国，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因为我要经香港参加岭南学院的董事会，一般会在香港停留两、三个礼拜，董事会开会期间可以抽出一天去岭南开研讨会，也很方便。2006年六月下旬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该校对访问教授有一些限制，规定访问期间每天都要上班，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访问期间随个人安排时间，很自由。），所以只能利用星期六去岭南学院开研讨会。

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我认为在岭南学院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由于没有充裕的经费，只能从如何鼓励、提高教师们的研究水平着手。我提出两点做法：一是鼓励举办研讨会，二是鼓励教师出国或在香港短期进修。例如安排几个教师去香港城市大学进修。最近岭南学院有一位博士生，我安排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生。普大的访问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访问学生，需要教学费，等于一年要四万多元美金，一般人付不起。另外一种就是参与合作研究的访问学生，用这个名义，普大一个月只收七百多元美金，很便宜。如果一个访问学生来三个月，一共十二个礼拜，普大一学期只上课十二个礼拜就结束了。访问学生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做研究。我就用这种办法安排一位研究生去美国。学费的部分由岭南支付，剩下的旅费和生活费就容易了，他们可以自己付。

至于全国性的经济学教育要如何进行，现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想办学，但有些地方有经费，有些地方却没有。有经费的学校会自动聘请知名学者来任教，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聘任周林的情形。厦门大学也聘请康乃尔大学的洪永淼教授担任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他也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的任职方式就如同从前该校的蒋硕杰教授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兼职的模式。近十年来我们岭南董事会常讨论如何改良岭南学院的教学环境，这不只是待遇高低的问题。例如1980年代林毅夫在北大成立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争取国外八个博士回去。即使待遇高达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外加北大提供宿舍，但是如果有人发现中国的研究机构很官僚，同事之间大家谈不来，研究环境不好，也不会决定回去。岭南学院可以提供类似的待遇条件，但工作环境

必须良好，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岭南学院的舒元院长为人很公道，认为凡事做得好就要鼓励。不像其他有些领导人是非不分，与自己有交情的就升官发财，赏罚完全与学术无关。这种靠人事关系升迁的现象举世皆然。

研究中国近代史，常发现地方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对于地方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例如顾应昌先生是上海人，他曾向中国政府建议，中央政府不应该从上海收取过多的税收财源，并建议让外资流入上海。当他考虑赠书中国时，他的助理毕业于南开大学，希望他把书送给南开大学，顾应昌先生却因为有同学任教武汉大学，自己也和武汉大学有点渊源，所以送给该校。可是他保留了最好的书籍，一套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期刊，预备如果有一天圣约翰大学复校时，可以捐给它。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校友关系、籍贯地域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我没有这种想法。例如 Chow test 的留学生经常邀请我，到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如果有时间，我会去帮忙捧场。如果有机会到他们任教的学校附近，我会顺道去看一看。我参与这些活动，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认识，了解现在每个大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岭南学院也是如此，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现在年轻的助理教授在研究什么问题，我也必须了解。因此，在岭南开研讨会，一来可以帮助他们，二来我也想了解他们现在的研究课题。



## 五、中国经济改革

### （一）经济改革与政策建议

#### （1）一九八四年

1984年七月我和赵紫阳见面，一如1980年见姚依林，也是透过招待单位的安排。王复孙与王泽农是和我接洽的人，何东昌是教育部长，所以陪同会见（可能北大校长丁石孙也去了，丁石孙后来因为在天安门事件之时，压不住学生闹事，受到责难）。在中国与领导人见面时，主客相对而坐，互相交谈。其他的陪客，包括我的太太Paula，都坐到一旁，一言不发很安静。台湾的情形可能不同，我和李登辉总统见面，与会者大家相当平等，在中国则上下主从之分很明显。

第一次见赵紫阳，我的印象是觉得他脑筋很灵活，答问之间反应很快。1988年Milton Friedman见赵紫阳之后写信给我，也觉得他很灵活，对他印象非常好。他很通晓经济实务的概念，因为他在四川农村待过，很有经验，虽然没学过经济学，一样有经济学概念。我认为做行政的人能有这种水准，很不容易，在美国也不多见。

我们的谈话内容有两个重点：一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二是中国经济改革。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谈话内容已记不清。1980年我和姚依林谈过的企业自主权，已在进行当中，所以这次谈价格问题。我认为用苏联计划经济的方法行不通，当时社科院的马洪、周叔莲等人已经批评苏联计划经济的毛病。中国虽然已承认企业应有自主权，不能完全由中央控制，不过物价仍由政府控制。事实上，在价格机能之下，以价格做为市场讯息指标很重要。然后我也问他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我很关心这件事。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多钟头。

次日（七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出我和赵紫阳见面的消息，我们会谈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提到邹至庄主持微观经济讲学班。此后「微观经济」成为官方用语，使这次会面对中国发展现代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讲学班结束后到各处去旅游。我去上海，由上海市长汪道涵招待；到杭州，则由浙江省长薛驹招待；我到广州，广东省长叶选平没有亲自来，由副省长王屏山代表出面。我到各地时，事先有国务院的人打电话，关照省市市长招待。可能赵紫阳希望各地方的领导与我多谈谈，多了解外面的想法和事务。这些谈话对我也增加不少见识。

我和赵紫阳、江泽民的沟通方式，除了见面会谈之外，还采通信的方式。有些事情双方见面之时并未谈到，而是靠事后写信来交换意见。有重要的事，我才写信给中国领导人，一年写个一两封信。1984年七月五日第一次和赵紫阳见面之时，我保留一些事情没有说，过一两天之后才写信给他，我建议取消外汇券，汇率由市场决定。中国外汇不足，就是因为把美元的汇率订得太低，政府不应该把人民币汇率订得太高。在1984年时，国内的观念仍然很保守，因为有其他许多人在场，我没有谈这件事，而用事后写信的方式建议让美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即使到1986年，国务院想要取消外汇券，也因为兹事体大而未实行，很多人利用持有外汇券图利，反对取消。可见即使政府愿意让汇率自由化，也不容易推行。汇率自由化终于在1993年开始推动。

1984年我和赵紫阳见面，曾谈到香港问题。我离开大陆之后去香港，想找人谈一谈香港的前途。招显洸医生介绍我和李柱铭（Martin Lee）在Court House见面会谈。李柱铭是香港民主派的重要人士，他和招显洸曾任职行政局，由港督派任。他们两人未必能代表香港，但在香港很活跃，是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我们三个人会谈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许家屯很不错。事后我写信给赵紫阳，说明我对香港的看法。

## （2）一九八五年

1985年七月十五日赵紫阳请我全家人吃饭，包括次子善智（James Chow）和女儿小梅在内。我一向旅行都带着家人同行。美国人的习惯是子女至上，在家里人人平等，所以我到欧洲、中国、台湾等地旅行，他们都跟我一道。我的小儿子善智和我们同到大陆，他在人民大学当助理，帮忙做些翻译、助教、改卷子、跑腿的事。一则他有机会向去中国教书的美国名教授多学习，再者也可以帮忙我的同事解决问题。人民大学付他薪水一个月六百元人民币，与教英文的美籍老师相同。一个大学教授薪水不到三百元人民币，六百元人民币大约等于二百元美金，在美国不算什么，在中国可说非常宽裕，因为二百多元人民币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房租每个月只要几块钱。但是如果去中国饭店，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二百元。1966年我回台湾讲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邢慕寰所长请我吃饭，一顿饭就吃掉他一个月的薪水。他有中国人好客的习惯，而生活在美国的人一般不会这样做。他在经济所和台大合聘，中央研究院没有给他接待费用，无法报销。我知道他在台大的月薪有多少，请一顿饭就吃完了，觉得很过意不去。

那一次请客，赵紫阳的左右手鲍彤也在座，我原以为赵紫阳请客只是聊聊天，没有预备题目和他谈，其实他别有目的。我喝了几杯茅台之后，脑筋不太清楚。突然听见他问可否请几位海外的经济学者对我们大陆的经济改革提供建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知怎么回答。于是我转个话题说研究中国经济不能没有资料，数天前我去过统计局要资料，有一部分没有要到。他回答说统计局或许不会把我需要的资料全部给我。其他的谈话内容都忘了，只记得谈到文革，他说文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把旧的思想框框打破。

在我和赵紫阳见面之前，陈一谘和宫着铭两人来找我，说赵总理要了解通货膨胀，想请我做个估计。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有两个最重要的单位，一是体改委，二是体改所。他们似乎各自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改革问题。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是1982年成立的，权力极大，由赵紫阳兼主任，安志文是副主任。刘培英担任我和体改委的联系人。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的所长是陈一谘。两者的体制不同，体改委是国务院之下的国家机构；体改所是赵紫阳的智库，帮他出主意，成员都是一些知识份子。这些人进行中国经济改革，他们的长处是广为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不管是美国、日本、东欧都可以。他们不问理论，只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种态度与邓小平说过「实事求是」有关。体改所有一些意见，体改委不一定赞同。六四之后，鲍彤是唯一被关入监牢的高级政府官员，于1996年获释出狱。陈一谘则去了普林斯顿。那儿有一批中国异议份子，其中五、六人较著名，他是其中之一。柴玲后来

也到普林斯顿，读了学位，在美工作。陈一谔和余英时常来往，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杨小凯去世的纪念会上，他来主持，我去致词讲话，于大海也来参加。

陈一谔和宫着铭两人帮赵紫阳做研究。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当年货币供给增加50%，所以1985年初首次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他们要我帮忙估计通货膨胀率，我在北京做了研究，写成一个初稿，后来改成我1994年*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书中的第十八章和2002年《中国经济转型》书中的第七章。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基本关系是  $\ln p = + \ln (M/y)$ ，亦即物价变动是货币供给与真实产出比率的变化、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上反应所需的时间，由此做出估计。我利用他们提供的资料，用自己带去的电脑（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购买，后来捐给暑期班），做出回归结果。我估计1985年一两年内通货膨胀率大概不超过7%-9%，事后证实果然如我所料。后来赵紫阳请我吃饭，他说已经看过我的报告。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他问我通货膨胀有无危险，我说不致于有大问题。此外，还提到李政道，他也在同一地点接待李政道。

关于中国经济资料的问题，第二天我和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后来升任校长）商量，我建议由政府官方提供资料，在人民大学成立资料中心。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写信给赵紫阳，请求拨派资料给人民大学。我派司机把信送去，两天之后赵紫阳的秘书来电告知已获同意。现在人民大学设有资料中心，规模不算太大，有发行通讯介绍各种新资料给学者应用。

1985年暑期讲学班结束后，我到各地去旅游。其中一站是大连，我带儿子和女儿同行，我们一起去游泳。大连市长招待我们，乘车途经造船厂，他说数月之前赵紫阳总理曾来此参观，指示造船厂进口技术未成熟的产品，不要硬是全部自己生产。我觉得赵紫阳的说法很有道理，过去中国有些人主张凡事都要自己制造，不肯从国外进口，因此赵紫阳的这番话不是一般经济管理者说得出来。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许多人都很佩服赵紫阳，说他领导有方。

对于赵紫阳建议请国外学者专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事，我当时未做正面答复。1985年回到美国之后，我对于中国的金融等问题有意见，所以在八月十三日写信作复，算是迟来的回应。后来他在八月二十四日给我回信，认为银行制度、金融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问题，都可以邀集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并要我和安志文、刘鸿儒联系。安志文是体改委的副主任。他曾经做过党委书记，我后来才从李志绥的

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得知他在 1960 年代曾帮邓小平办事，是老资格的党员。刘鸿儒为人很灵活，曾在苏联研究银行制度，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和他们联络之后，他们寄来一批资料，数量不多。我建议大家在香港会面讨论，主要理由是蒋硕杰先生在台湾担任半官方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不方便去大陆。我希望他能来香港参加讨论，他终究没能来。另外，我原先曾建议请刁锦寰院士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顾问，他甚至表示愿意捐赠电脑给国家统计局。后来取消了，可能因为时间、地点不合适，他没有参加，不过他自己在中国的活动很多。

### (3) 一九八六年

1986 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我和费景汉在香港与中方人员展开会谈。他们由安志文和刘鸿儒率领，共有六、七人。我们的会谈都做了记录，讨论的范围很广，主要在于银行制度的改革与物价水准的控制，这也是同年六月我们第二次会谈的主题。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讨论，吃过午饭之后继续讨论到晚上。会议一共进行四天，结束之后众人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二次会谈在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举行。当时我正主持暑期讲学班，主题是计量经济学，邀请Richard Quandt、Angus Deaton来讲授。参加会谈的海外经济学者，除了我之外，还有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蒋硕杰仍未参加。中方人员仍由安志文、刘鸿儒安排，主要是体改委的人，由于不去香港而在中国本地举行，参加的人更多，发言者有八、九人，另外有十人左右旁听。印象之中议题范围极广，无所不包，思想观念很开放，没有框框的限制。安志文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具备政治可行性。苏联的政治改革开放速度很快，中国则进行缓慢。因为思想改革很难，过去一直要求干部往左，现在忽然改成往右，容易引起干部不适应的反弹情形。所以制度不能说变就变，需要时间调适。会谈结束之后，赵紫阳宴请与会学者，并且要我们代为问候李登辉、俞国华。他的态度很诚恳认真，但是到了台湾之后，我并没有这么做。这件事在当时太敏感，我如果代为致意，可能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代表，我不愿意做他个人

的代表。如果换成是 1990 年代，我大概会说也不一定，但在当时太敏感了。离开大陆之后，我们几位院士就一起前往台湾。抵台之后，我和蒋硕杰先生谈过在大陆开会的情形。

#### (4) 一九八七年

1987 年我和顾应昌再度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会谈。体改委之下有中级干部，包括来自各省的人，我们大约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中方的负责人说：「凡是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都可以学。」我听了印象很深刻。1987 年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最为重要。其中之一是杨培新主张将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国营大企业之上。从前承包制只限于农民，他们将劳力投入在土地上，交纳固定税额，包产到户，多劳多得。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小商店的经营之上。至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盈余利益是否归管理人，则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社会主义是否容许管理人由利润中多得好处？二是农业生产不需要太多的原料，主要靠劳力投入，所获不多。但是大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投入，成本受价格高低影响，所以获利多寡不见得代表效率高。最后仍对国营大企业采承包责任制，由企业与企业与政府签订合同，每年上缴政府一个固定金额（比方说五百万元），多赚的盈余企业可以保留使用。但管理者不能自取太多，因为其他人不容许此事发生。在美国亦有类似的情形，1990 年代经济不景气，企业不断亏损裁员，管理者却不断自我加薪，因此大受抨击。在中国就不行，大家不容许这种情形发生。1987 年一年之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有企业加入此一计划，所以是这次会谈的主要重点。国有企业采承包制之后，经营效率没有大幅提高，反而产生许多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迄今仍然问题重重，例如劳动市场不自由，企业不能裁员，因为这关系社会安定问题。

现在中国的劳力市场已经灵活多了，大量工人从工资低廉的内地流向工资较高的沿海各省，显示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过去国有企业雇用工人等于是社会福利制度，不能随便解雇工人。1990 年代开始试验实行一种变相的解雇办法，由企业支付员工四分之一的工资，使其不至于挨饿，迫使员工出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称之为「下岗」。饶是如此，国有企业仍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劳动力就业只是其中之一。

## (5) 一九八九年以降

1989年三月中旬我与中国体改委官员再度在香港举行三天会谈。海外学者除我之外，还包括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中方仍由安志文、刘鸿儒率员参加。会谈的主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1988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大约增加百分之五十，所以解决通货膨胀是最迫切的问题。蒋硕杰主张提高利率。会谈结束之后，中国随即大幅提高利率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另外，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通货膨胀，后来通货膨胀问题终于解决，部分原因即可能与六四事件导致有效需求降低有关。

我们和中方代表会谈之后，三月十六日利荣康宴请与会经济学者，由香港前途研究会会员作陪。包括利荣康、陈坤耀（Edward Chen）、招显洸、李鹏飞（Allen Lee）、李福兆、倪少杰、谭惠珠、董建华、黄宜弘（Philip Wong）、胡应湘、伍沾德等人。席间我预测一年之内中国政府将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陈坤耀当时是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1979-1995），他不认为大陆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不同意我的看法。顾应昌则支持我，说我素有铁口直断的记录。事后证明我的预测完全正确。Milton Friedman 的看法也和我完全相反。1989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写了一篇短文，预测中国将陷入经济混乱与高度通货膨胀之中。此文后来收入《佛利民在中国》一书中。我收到这本书之后，在1991年一月二十二日写信给他，指出他在1989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看法稍嫌悲观，特别是有关预测中国未来的部分。1991年二月七日他回信说我完全正确，他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所做的预测，何止「稍微」简直是太过悲观，尤其是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测。这件事让他学会他对中国所知有限，最好不要随便预测。他不吝大方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在是个令人敬佩的学者。可是言犹在耳，他又预测1997年之后中国不能同时使用港币和人民币两种不同的货币，忘了前车之鉴。

1993年中国再度发生通货膨胀，1994年一月十二日我在香港演讲〈一九九〇年代中国是否能免于严重的通货膨胀？〉（“Can China avoid serious inflation in the 1990s?”）。我的看法大致是乐观的，中国曾经在1985年、1988年、1993年发生通货膨胀，最后都能加以控制。